

五

加紧奴化教育
推行愚民政策

抗日战争图书馆藏书
www.krzzjn.com

伪满普及日语教育的奴化作用

安希元

伪满初期，中、小学校即添授日语，大抵由日本人教员讲授。当时日语授课时数在课程表上占的比重还不小，大约占中国语文授课时数的二分之一。中国语文教科书还叫做国语。大同2年（1933年）以后，日语授课时数逐年增加，待新学制实施以后，伪满当局为彻底推行奴化教育，日语教育的普及放在首要地位。这时把中国语文教科书由“国语”降为“满语”，表面上它和日语并列，实际是要以日语代替“国语”。市内各级学校增加了许多日本人教员，他们不光是担任日语课，也担任其他各学科的讲授。上课时不管学生听懂听不懂，都用日本话讲课。学生为了弄清楚课程的内容，就不得不努力学习日语。每天朝会上日本人教员向学生发表事情时，除非极重要的事情而用翻译外一般都是直接用日语讲。同样在教职员会议上日本人副校长或日本人教员讲话时，也都用日语，这也促使教职员不得不极力学习日语。有些中学还规定：入学试验，日语不及格不录取；学年试验，日语不及格不能升级。更有许多中、小学为了加强学生对日语的学习和运用，实行所谓“一日一语”。就是有计划地每天规定出一句日本语，由值日教员把这句话写在迎门的大黑板上，使全校学生清早一到校首先就看到这句日本语，限令学生当时就念几遍。回头在上课时，老师也首先问学生今天的“一日一语”是句什么话，有什么意思，学生回答后，再令全班学生念几遍。晚上放学时，值日教员还要向学生问一

遍，学生答对了，才能放学。经过一个阶段还要在班上对这一阶段的“一日一语”实行测验。教室墙上挂着“片假名”和“平假名”字母表，高年级并用假名拼音表来装点教室，使学生一抬头就可看到日本文字。训练学生用日语讲话，举行定期的日语比赛会，成绩好的给予物资奖励。另外，训练学生早晨到校向老师用日语问早安，晚上离校时也要用日语向老师问晚安。因此早晨入校和晚上离校时，全校到处都响起用日语问“早安”和“晚安”的嘈杂声音。正是利用了这样的教育环境，来使学生耳濡目染的渐渐地满脑子装的是日语。尤其一年级的孩子一入校就走进这样的环境里，容易先入为主，目的是使他们不知道自己是中国入。

再看看日语补习班推行日语教育的情况。教育厅为了使各机关职员及一般愿学日语的人随处得到学习日语的机会，拨出一笔经费在各机关内和地点适中的学校，开设日语补习班。日语补习班的授课时间是在晚间，补习班一开课就很快发展起来。因省实验小学地点适中，教育厅便允许在该校开设一班日语补习班。当时我在实验小学担任校长。这个补习班由毓文中学日本人教员金子乐担任讲课。最初补习班仅40余人，开课后不久，就由40人发展到七八十人，一个班容纳不下，便又增开一个班，由女子中学日本人教员荒木员一担任讲课。后来两个班人数最多到100人以上，还有许多人要求入校，因为限于教室容纳不了，没能够完全收入。一处如此，其他各处补习班也可想而知。日语补习班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快呢？其原因在于各机关在职人员的工作需要。当时各机关的往来公文都是用日语写的，职员不明白日语，不用说用日文来写公文，就连看都看不懂，怎么去应付工作呢？机关主要负责人都是日本人，他们当然都用日本语分派工作，职员不明白日语也难于应付。因此，各机关职

员不得不努力学习日语。日语补习班规定每晚上课两小时，从晚上7点到9点止。可是学习的人们真表现了“求知若渴”的精神，下课后总有许多人围着日本人教员问这问那，我也是其中的一个。金子乐和荒木员一对学习的人“求知”的要求，表现得十分耐心，总是有问必答。本来他们9点钟下课应该离校，可是他们经常在10点钟以后才离开学校。学习的人们异口同声地称赞他们的“热心”，其实他们这样做，原是为了完成奴化教育的使命，同时却又博得被奴化教育者的好评，也算是“一举两得”了。

伪满当局还利用奖励和升官制度来推行日语教育。康德3年（1936年，大概是这年吧）制定语学检定制度，日本语检定合格，给予语学津贴，以资鼓励。语学合格按程度分四等，即特等、一等、二等、三等。特等合格给予津贴25元、一等15元、二等10元、三等6元。一、二、三等津贴以三年为限，比如三等在合格后三年内考不上二等，即停止发语学津贴，二等考不上一等，一等考不上特等，也同样处理。语学检定试验每年举行一次，由语学检定委员会组成检定小组，分别在各省区举行。当时我在伊通县公署担任教育股长，虽然在日本镀过一次金，但日本话并没有学好。日本人宫崎视学极力鼓动我去新京（长春）应三等语学试验，他还替我报了名。记得检定试场是在大经路小学，主试的共3个人，其中一个人（中国人）是熟人，他见我进来，第一句就说：“你这么大年纪（38岁）还扯这个做什么！”我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既然来了，也就试一试吧，他胡乱问了我几句就算完事。因为应试的人很多，他还忙着问后来的人。以后不知怎的，我还合了格。我以后再也没有应二等语学试验。

伪满官制有特任、简任、荐任、委任之分。委任和特任不

分等级，简任和荐任分等级。荐任以上叫做高等官。荐任官一般须经过考试（也有认为资历相符，不经考试的），叫做高等官考试。高等官考试条件之一，须有语学检定三等以上合格证明，因为考试时直接用日语回答问题。考试有初试、复试之分，初试合格才能参加复试。康德7年（1940年）我正在乾安担任农业学校校长，一天忽然接到高等教育科通知，于某月某日（日期已忘记）到新京文教部参加高等官考试。我觉得这是意想不到的事，考试前一日高高兴兴地回吉林，第二天便和一帮应试的人（吉林应试的有十几个人）乘早车到新京文教部报到。等到下午4点钟呼到我的名，我随着来人走进试场一看，嚯！这个排场，可和语学检定试场大不相同。上首一连排坐着四五个穿着礼服的日本人，都摆出一副庄严的面孔，下面放着一支椅子是给应试的人准备的。我的日语本来不好，一看到这个场面，更不能对答如流，约经过二十分钟的考问，总算完了。我想完了就算完了，没想到初试还合格了。初试合格自然就有资格参加复试了。记得复试在当年的冬季，试场是伪满的“国务院”。试场的安排又和初试不同了，场内上首高高地坐着十几个考试官，大概坐在中间的就是主考官，下首坐的两个人担任记录。我坐定即由主考官叫右面一个人提出问题，大抵是关于“东亚共荣圈”的一些问题，当时日军已占领了南洋群岛一部分。他问我：“皇军都占领了哪些岛屿？”我哪里能答得出来。接着又由左面的一个转换了话题，问我的志愿，后来又由一两个人问了一些有关时事的问题。约经过三十几分钟才叫我退场。当时虽然是冬季，出来时却觉得浑身是汗。

语学检定、高等官考试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为了准备好日语，不知费了多少时间，消耗了多少精力，这正说明了伪满当局利用奖励和升官诱引的方法，来尽力

普及奴化日语教育的又一个方面。

伪满吉林市小学教育片断记

杨文建

一、奴化教育的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在伪满建国初期是日本侵略者统治我国东北的开始，教育重点首先是废除中国原有的教学秩序、教学内容和教材，代之以日伪的课程设置和教材，并声嘶力竭地宣扬王道教育。下令各学校讲课以“孝经”、“四书”为教本。当时我在吉林市立第五小学校任高级班教员，就讲孝经和论语。1932年5月的一天，伪吉林省教育厅厅长荣孟枚偕同随员到校视察，并在我教的这个班听了我讲孝经课。当时伪文教部发出通知，强令各中小学校教室内一律不准悬挂中国地图，全东北都不得悬挂中国地图，也不许观看；不得使用“中华”字样；不得使用中国教科书。在课程安排上开始讲授日语课。当时在吉林市小学中，班级比较多，并设有高级班的学校，自1932年底先后派日本人来校任教务主任并兼教日语课。吉林市立第五小学校也派来了一名叫芝野盛秀的日本教员。

1935年，伪满编写并出版的进行奴化教育的新教材足有20多种，分别发给各年级使用。在课程安排上日语课列为主课。从这以后，原有的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教育课程，全部被摧毁殆尽，整个学校教育，完全被日本侵略者控制和操纵。1935年5

月，溥仪访问了日本回来后颁发《回銮训民诏书》。伪文教部通令各学校师生都得认真诵读。从此“日满一德一心”便大讲而特讲起来。每天早晨晨读时教师便率领学生咿咿唔唔地念起来。当全吉林市小学生举行书法竞赛时，就以这“诏书”为内容用墨笔来默写，并选评优秀者予以奖品。

当时在各小学校中，教学方式方法都得依照日本国内小学那样来进行教学。音乐课多是教日本歌曲。如《桃太郎》、《春天来到了》等等。上体操课喊口令也得用日语。

1934年秋，溥仪在关东军的示意下，曾从伪新京到吉林市小白山进行望祭。市内各中小学师生，齐集吉林市西南通往小白山去的温德河子桥下东侧，参加迎送仪式。当溥仪坐着的红色敞篷汽车和一些随员坐的汽车来往通过桥上时，迎送的师生都得低下头来，不许仰视。直到这些人从桥上通过完了时，我们才各回各校。

第二阶段：

实行“新学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进一步确立奴化我东北中国人的殖民主义教育制度，于1938年开始正式实行“新学制”。直到1945年伪满垮台止。

什么是“新学制”？所谓“新学制”是在小学教育阶段仍采用四二制，前四年初小改为“国民学校”，后二年高小改为“国民优级学校”。这样年限缩短，课程减少，学生的知识面狭小。况且以日语课为主课，再加重劳动作业课，学生的文化水平显著降低。“新学制”教育的根本特点，就是殖民奴化教育。当时伪民生部的“训令”里说：“新学制”的任务是“为养成忠良国民，即以建国精神为基础，陶冶人格，涵养德性”。从这个“训令”中充分看出就是要东北人民规规矩矩，俯首贴耳，充当日本殖民主义者任意驱使和宰割的“忠良”亡国奴。

1938年春季开始，吉林市各小学校校名一律改换。如吉林市立大马路两级小学校，高级班改为吉林市立大马路国民优级学校；初级班改为吉林市立大马路国民学校。在同一个学校门口，同时挂上两个校牌子，学校印章也分成两个使用。而对吉林市郊区原有的私塾也加以限制。除部分解散、合并外，留下的寥寥无几。同时以“国民义塾”名义完全控制起来。当时吉林市仅存留龙潭区的白泥多河国民义塾一所就是一例。实际上就连私塾也被取消了。

在这种殖民主义教育政策的奴化下，学校师生都必须“虔诚诚意”地崇拜日本天皇和伪满皇帝。从大力宣扬“日满亲善”、“民族协和”的“王道”转换为大力宣扬“八紘一宇”的“皇道”。对溥仪颁发的《即位诏书》、《回銮训民诏书》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所发布的《时局诏书》等，都要求学生背诵、会默写。记得当时师生都剪发成秃，戴战斗帽，腰后系一条手巾。这样表示决心支持“圣战”。

这些诏书（誊写本）都高高地放置在每个学校校长室内，对它必须精心在意地加以保管。如有丢失，便依法惩罪。每日早晨，教职员工到校后首先得向它致敬。

“新学制”实施后，小学设有一门“国民科”课程，这门课程是把日本殖民主义政治和语文混在一起而编写的教材，教材中有一半是用日语讲授的。这样就占去全部课程的二分之一的的时间。1942年后，小学还单开设一门“建国精神”课。这门课程的内容主要讲“日满一德一心”、“精神如一体”、“日本亲邦”、“大东亚共荣圈”等等。同时把地理和历史课都取消了。在“新学制”中还把日语课和中国语文课课时列为相等，并把日语课也列为国语课。这样就突出日语课和日语教学所占的课时数。

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加速使日语成为“国语”，从1936年开

始，实行日语的“语学检定制度”，每年举行一次考试。考试合格者依据成绩分别可取得日语“特等”、“一等”、“二等”和“三等”资格。除发给合格证书外，在头一年里还发给补贴费。学生考学校或就业都要看日语的资格。

在语文教本中，充满了反动内容。日本历代天皇、历代将相武士、宗教迷信故事等等占满了课本。大肆宣扬“惟神之道”、“八纮一字”等等。胡说什么伪满的原始不是起源于中国，而是和日本一样开始于“天照大神”。又胡说什么伪满是在“天照大神”的“神光”保佑下建立起来的。溥仪和日本天皇亲如一人，伪满就应该归日本管辖，而把原来的“友邦日本”、“盟邦日本”进而改称为像父子关系的“亲邦日本”。1942年9月5日伪满国歌歌词也改换为“神光开宇宙，表里山河壮皇猷，……”的新歌词，更炮制了一个共五条的所谓“国民训”，强迫学生背诵。其第一条就是大肆宣扬“惟神之道”，内容是：“国民须念建国渊源发于惟神之道，致崇敬于天照大神，尽忠诚于皇帝陛下。”实际“天照大神”本来是日本统治阶级为维护其天皇制而设置的一个日本迷信的天神。这样无中生有炮制“惟神之道”，强加在小学生的幼小心灵上，使他们无论在精神上、意识形态上都遭受了严重的摧残。

二、学校的合并情况和校内编制

1. 合并情况：

在吉林市政筹备建设时期，设有市立小学10所。第一小学在当时的运动场内，第二小学在巴尔虎门外，第三小学在北极门外，第四小学在致和门外，第五小学在西关迎恩街，第六小学在西关五道胡同，第七小学在西关西石砬子，第八小学在黄旗屯，第九小学在东关文庙西侧，第十小学在东关南昌邑屯。这

10所市立小学校除第一小学在吉林城内，其他9所小学均在城外。城内和城郊均有永吉县和省设置的小学。在市立10所小学中以第五小学校班级最多，有初级班8个，高级班5个，其他各小学均为初级班小学，这10所小学约计共有48个班，教职员工62人，学生数为2000余人。1935年，吉林市立第五小学校被伪文教部指定为吉林市模范小学校。学校增派日本人主事一名。1936年吉林市成立后，由于市区扩大，加强市政管理，将在吉林市内设置的吉林省立模范小学和永吉县立模范小学划归吉林市管理。又将永吉县城区的永吉县第一、第二、第三高级小学和提法司与临江门小学等5校以及省师范附属小学及省女附属小学先后都划归吉林市管理。1937年“新学制”实施后，由于吉林市郊区扩大，成立江北、龙潭、江南、白山等区，原属永吉县管理的犬常屯、大红旗屯、温德河子和江北棋盘街朝鲜族小学均划归吉林市管理。同时将原吉林市致和门外和北极门外的小学合并一起，新建北山小学校。而把城内的市立第一小学撤销。永吉县城区后新街、卧虎屯、东昌邑屯和车站巴尔虎屯小学也都划归吉林市管理。从表面上吉林市小学数目比原来10所增多，但都是由省、县划归过来的。

2. 校内编制：

伪满的财政支出，军事治安经费占30~40%以上，而教育经费少则不到1%，多则也只占2%而已。由于教育经费的减少，学校教师人员的编制就要紧缩。当时吉林市小学教师人员编制异常紧张。一方面由于日伪对教师经常进行迫害，人心惶惶；另一方面由于从事教育工作生活毫无保障，奈难度日。每个小学校教师人员编制原则上一班一名教师，什么课程都教。只是有高级小学班（国民优级学校）的设有专科（音乐、体育、图画）教师。只有两三个班的初级小学校（国民学校）校长也同

教师一样担任一个班的课程，校长是兼任，不专设编制。各学校都有一名日本教员（有的兼校），有高级（国民优级）班的学校则多设一名到两名日本教员，他们除教日语课外，并管理学校。

学校设校长一名，下设教务、训育、体育和事务四个部。各部负责教员称为主任。教务工作主要是掌管教学进度和编制授课时间表等。训育工作主要是管理学生。体育工作主要是训练学生。而事务工作则主管收“授业料”（学费）和校内房舍维修以及购置事项。

教员工资待遇非常低薄。每当寒暑假期间，因为不上课，就给教员开半工资。女教师在产假期间，由自己找代课教师，代课教师工资从自己工资中支給。

教员根据出身学校分为教谕、教导和教辅三种。完全师范毕业的为教谕，而教谕又分为三等；师范讲习科或师范特修科毕业的为教导；而中学（国高）毕业的为教辅。教辅多是代课教师。这三种教师根据教学年限等经考试都可进级。随着师资种别不同，工资待遇也不同。

三、进行奴化教育的几项主要措施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达到奴化我东北青少年一代的目的，不仅在学校课堂内采取了种种奴化措施，在课外也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其主要内容有：

1. 强迫小学生劳动，严重地摧残了孩子们的身心健康

由于劳动强度大，任务重，一年四季终日不得休息，许多学生患了病。每天强制性的劳动很多。所谓“勤劳奉仕”就是强制性劳动的代名词。在每个小学校的教员室中都挂有“月中行事板”一块。在那板上每天都写上安排的劳动项目。今天到

吉林神社去清扫，明天去铺马路，后天到校园去割草，大后天去挖沟。小学生终日不得休息，毫无复习功课时间。这些青少年们由于终年劳累，干不动也得勉强去做，弄得疲于奔命，劳累不堪。有的班级劳动差一些，日本教员轻则加以斥责；重则下毒手痛打。

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协和会对小学校青少年的法西斯式的控制和奴役，更是变本加厉。从1941年起，伪满吉林市协和会把对青少年的所谓“教化训练”作为它的重点之一。当年3月5日，协和会里成立了青少年团统监部，把各学校的青少年都纳入这个团里。在各小学中都成立了“勤劳奉仕队”，还发了一个旗，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效力。当时它们提出“训练就是活动，活动就是训练”的口号，强迫小学生去修筑道路，挖沟渠，抬木头，担负各种沉重的力不胜任的劳役。说这也是“勤劳奉仕”。实际这就是从事无报酬的劳役。

2. 利用每天朝会和节日集会搞奴化教育

每天朝会时，全校师生按班级在操场上分别列队等候全体教师。在体操教师的日语口令下全校学生都肃然静立。朝会程序，首先是向“皇室遥拜”，一齐背诵《国民训》。接着学校训育主任讲话，值日（值周）教师提出要求或通知事项。最后全体师生做“建国体操”，完了后，学生分班拉队边唱歌边走回教室。

伪满公布的法定节日有“元旦”、“建国节”、“祀孔”、“万寿节”、“五·二访日《回銮训民诏书》颁发纪念日”等节日。学校内有“开学式”和“毕业典礼”等。在这些节日里，校长穿上协和服礼装，捧读《回銮训民诏书》。另外根据节日性质不同，讲有关节日的事项。

3. 利用封建迷信占领意识形态领域

日本侵略者为了掩盖侵略本质，大肆提倡“王道主义”，建设“王道乐土”。于是在每年春秋两季丁日举行祀孔仪式。当日，各校师生拉着整齐的队伍，衣冠楚楚，都早早地到吉林市东关文庙去集合，参加祀孔仪式。各学校师生按指定顺序分别列队，肃然静立在大成殿阶下，听候司仪者宣布祀序。首先是奏乐，主祭人致祭，献三牲，行三鞠躬礼后，唱“泗水之精尼丘灵，博学而无所成名……”孔子赞歌，司仪者宣布礼成，各学校便带领自己学校学生返回学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伪满于1941年12月8日发布《时局诏书》，并从此规定每月8日为“诏书奉戴日”。在这天早上全校师生集合，校长照例穿上协和服礼装，读《时局诏书》后，全校拉队到吉林神社去参拜，祈祷“武运长久”、“圣战辉煌”等。

4. 训练教师

关于训练教师（校长）可分为一般和特殊两个方面。一般的是在寒暑假中集合全市小学教师和校长编成中队，下分小队，进行军事训练。同时还找省、市主管部门负责人来队做政治报告、时局讲演、军事报告，还讲述“惟神之道”等等。特殊的就是专对20多名小学校长进行训练。训练的内容有：

一是强行军。强行军是组织这些小学校校长进行长途行军。记得在一个炎热的暑假中，伪吉林市公署教育科将20多名校长集中到市维新街小学校听讲演后便由吉林市出发奔向江东龙潭山。这时我正在吉林市大马路小学校当校长，当然也得参加这次训练。当我们到龙潭山上时已傍晚，便在龙潭山上庙宇中睡下。夜中雷雨交加，一直下到次日早上。在宿雨初晴热气蒸人的盛暑里，便奔向龙潭山之最高处南天门，从这里下去沿着去往小丰满的铁路沿线，一直走到小丰满。自山上往下走的时候，道路泥泞，越走越滑，越滑也就越跌倒。我们滚了一身泥巴，好

不容易走下山来。每个人浑身是汗、泥呀、水呀，简直成了一个泥人。顶着炎炎赤日，每个人强走也走不动，双脚都打成血泡。到小丰满时，都累得精疲力尽，又饥又渴，躺下去就睡着了。次日返回之前教育科的股长（日本人）还斥责了大家一阵。

二是打坐。打坐也叫打参，日本话叫坐禅。日本国家是以神道设教的国家。认为神是有无尚权威的。他们信仰神道和佛教，具有十足的迷信色彩。在一个寒假中，有一天高天飘雪，大地冰封，寒气凛人，阴霾密布，伪吉林市公署教育科将20几名小学校长集合起来，在日本教员的监督下，齐聚吉林市西关温德河子桥北端的吉林市自来水公司的楼上，吃住在这里。

受训科目是每天上午听讲建国精神、日本神道，下午进行打坐。打坐是由吉林神社派来的和尚。那和尚讲“打坐要万念俱空，唯一祈祷日本大东亚战争武运长久”。我们每天打坐，初则不习惯，腿脚全麻木；继则感到异常疲累，全身疼痛。那从神社找来的日本和尚可以凶恶了。他身穿法衣，手持戒尺（竹板），当我们打坐时就在背后巡视。看肩背稍有弯曲向下垂落时，从身后就偷偷地狠狠地用戒尺击打一下。这样每天下午不知挨多少回戒尺。每日早晚还由这和尚领着念日本经。饭前饭后还得表示感谢，并祈祷。这次在这里训练了一个星期。

另外，有时还派遣教员到外地去学习。有的由省、市派到伪新京（现长春市）南岭教员讲习所去学习，时间是6个月。有的是由伪文教部（民生部）派遣到日本去留学，时间为1年。有的派到大阪府天王寺师范学校，这之中有的到熊本青年学校，有的到日本东京府青山师范学校。我就是被伪文教部派遣的第五届小学教员留学生，与黑山县打虎山小学高翔九一起到青山师范学校二部二年班去学习的。

伪满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发

张耀先

在伪满文教部教学司设有编审部，由日本人加藤任部长，成员有几名日本人和四五名中国人，分别负责担当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写工作。由伪满图书会社统一印刷出版和配售。

我在名义上是编审官，实际是办理事务官的事务，在部长办公室里办理有关教科书的配售和一般庶务事项。在业务上常与编写教科书的人取得联系，又因和编写“满语”的中国人金大镛及编写历史的日本人木谷在日本同学，所以对编写的内情有所了解，仅就所知，述之如下：

一、统一编审，加紧奴化

在伪满奴化教育政策的指导下，所有的中小学教科书都集中在文教部，由编审部负责编审借以达到其奴化中国东北青少年的罪恶目的。

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东北的初期，各地中小学还仍然分别使用中国时期的教科书，只对富有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的部分教材加以删除，或对个别地方用墨笔涂抹。其中视为涂抹对象的是地理和历史教科书。后来干脆禁止使用旧教科书了。凡是中小学的课本，完全统一由文教部编审和翻译，交由伪满图书会社再进行统一印刷、出版，并直接配售。为此，在伪文教部教育司成立了“编审部”，专门编纂中小学校使用的教科书。其编纂的原则必须以“日满亲善”、“王道乐土”并忠于“皇帝

陛下”、信奉“建国神庙”的建国精神为思想基础。从小学到中学的课本内容，充满了民族自卑和崇拜日本的殖民地教育的浓厚的奴化色彩。

二、以假乱真篡改历史

我曾接触过的所谓日本历史学家，如教日本历史的峰内教授和教东洋史权威的高岩博士，他们为了充当“御用学者”，替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服务，往往信口雌黄，歪曲历史事实，并且自圆其说地伪造一些荒谬的论调和逻辑强迫人们相信。

就拿日本的所谓“天照大神”来说吧，在日本古代史上只是一种模糊的神话；在日本近代史上明治天皇统治时期，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式，要求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于是在“尊王攘夷”运动中，人为地臆造出“天照大神”这个偶像，借以维护和强化中央皇权的统治基础。到19世纪末，日本走上帝国主义时代，飞扬跋扈的军人、政客积极向外侵略扩张，便大张旗鼓地抬出了这个偶像作为撞骗的招牌。并且胡说什么日本的皇室完全是由天照大神作鼻祖而“万世一系”传下来的，当代的昭和天皇即是“现人神”了。在日本国内企图用这种论说实行“愚民政策”，防止人民反抗。

为把这个论说适用于中国东北，于是就进一步加以引申，硬说“天照大神”在有人类历史以前就存在，她不但日本的祖先神，而且是全人类的祖先。不言而喻，当然也是所谓“满洲国人”的祖先了。因此在编伪满历史的草稿上，首先肯定了“满洲国”的祖先是“天照大神”。这就是说利用神话来作为解释其“同文同种”的侵略学说的依据。证明日本人来中国东北统治不是侵略，而是以同一子孙的身份，来分占土地，是理所当然的。用木谷的话来说：“满洲国人里就包括日本人，日满是

一个祖先，经营祖先的土地，开发祖先遗留下来的资源，人人有份。”想从根本上奠定牢固的基础。所以，在伪满首都的“新京”伪帝宫营造地的上头，建有一个“建国神庙”，占据最优越的地势，把它放在伪帝室之上，这就充分说明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了。而建国神庙里所供奉的就是论说里的“天照大神”。在木谷编写的伪满历史上，首先把“天照大神”搬来给中国人当“老祖先”。有一次木谷编纂历史时对我说：“再过10年20年，天照大神的威力，在满洲青年一代里，要起更大的作用。”可见其用心之毒了。

至于有关近代史中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竟颠倒黑白，进行种种歪曲。说什么“甲午战争”是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膺惩，是由于中国人不守信义而引起的。“日俄战争”则是日本人的仗义行为，为了挽救“满洲人”的痛苦才打仗的。更为荒唐的弥天大谎，竟把现代史上的“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东北，说成是东北人民痛恨张氏父子（张作霖、张学良）的残暴，群起反抗，由东北人民恳切的邀请，日本皇军才仗义兴师，帮助东北人民驱逐张学良军队，以便东北独立自主，人民安居乐业。起初日本帝国皇军不肯管别人的闲事，但是鉴于同文同种的血肉关系，不肯坐视东北人遭受的痛苦，才出仁义之师，帮助满洲建国，使人民享受“王道乐土”的幸福生活。这完全是一派胡言乱语，信口开河地编成了历史，强迫中国人去教中国青少年。不怪木谷说“再过10年20年，天照大神要起作用了”。至于在历史上把满洲（东北）从中国版图分裂开来的捏造论据，更不胜枚举了。

三、文字同化，重日轻华

日本统治朝鲜和台湾，所采用的最毒辣的手段之一，就是

用日本文字来代替当地人民的固有文字。当时的台湾人，不使用中国文字，朝鲜的文字也被日本文字所压倒。日本统治“满洲”也是采用这种手段。首先是到处推广日本话，反映在教科书上是小学从一年级开始，就要学习日文，并把日语同华语（“满语”）同等并列。在编纂上是把重点放在日语上了。对日语的文法语条等，尽量推敲研究，积极商讨怎样才能使“满洲”的青少年在学习日语上，容易掌握和消化，开会座谈，现场调查，忙个不休。编审部的费用，也是在编写日语方面使用的最多。可是伪满语则是马马虎虎，既不开会研究，也没作过一次现场调查。编满语的人无事可作，有时随便选几篇古文或孔孟的经学，经由研究满语的日本人圈点或指定，自行琢磨，安插在满语课本里。至于学生能否接受和能否提高语文知识却无人问津。更严重的是满语里掺杂一些所谓“协和语”，就是使用一些日本人惯用的汉字来当作满语，如“新京”的朝日街，便在满语里写成朝日“町”，把十字路口写成“过町”。以及“你的挺好”，“我的如何”等似通非通的语言，也搬到课本上来。如把“电影”二字变成了“映画”。更有甚者是把理化专用名词也完全用日文来表示，所以使学生在在学习上就是不会中国文学，而只要懂得日文，就能顺利地完成任务。因此，只要精通日文，就万事大吉了。“国高”（中学）的课本深浅程度只相当于日本小学的后期程度。但是国高毕业以后，就可直接升入伪满的“大学”。当然这样的大学，是赶不上日本国内的高等学校的程度。

四、图书株式会社垄断教科书刊物的出版和印刷

在出版行业里，印刷出版教科书刊，利润最大。为排挤中国人经营业，在伪满洲国成立后，“满洲图书株式会社”成立了。

它对教科书、刊物的出版，进行垄断。教科书的配售办法，是由编审部负责分配。首先是由各市、县将所需用的教科书数量，汇总报省教育厅，再由各厅处负责报伪文教部，预约定购。文教部再根据具体数字，向图书会社订货印刷。图书会社依照编审部核定的数目，再向各省按比例直接配售。由于战争连年，纸张奇缺，印教科书很成问题。因此必须由文教部派人去日本大阪等地几家大纸业公司交涉，仅能买来满足不了需要数量一半的纸张。依照合同规定，凡由文教部交涉来的纸张，必须全数交由图书会社使用。在一次文教部召开的教科书的配售会议上，讨论印刷课本纸张分配比例问题。印刷课本需要纸张最多的是日语和满语课本。与会人员，意见不一，当时在座的文教部大臣卢元善郑重而满怀信心地说：“日语最重要，中小学学生，学不好日语对将来的学习和作事情，都要成大问题，这是个基本性问题，对印刷日语课本的用纸，不需要考虑，必须满足它的需要。满语课本，可以少印一点，两三个学生有一本满语课本。满语吗，学不学都会。在满足日语教科书用纸以后，把剩下的纸再印刷满语课本就行了。”会后，日语课本大量发行，满语的发行数字，还满足不了三分之一的要求。据说农村小学根本分不到满语课本，而只好全学日语了。

有一次编审满语的金大镛请加藤部长吃酒，由我作陪。酒饭之余，加藤说：“你们会日本语，懂得日本事情很好。将来满洲人必须和台湾、朝鲜一样，渐渐地使用日文代替汉文，只有使用同一的文字（日文）才能真正达到‘日满一德一心’。同时满语有多难哪，学会了日文，自动地不用汉文了。你们看，在官厅里很多思想好的青年，不都是互相之间不说满语了吗。”接着又说：“我的最大任务，就是怎样能够尽快地通过教科书使青年一代都会日文，喜欢日文，放弃对满语学习兴趣。”还说：

“台湾用了将近30年的功夫，完成了文字的统一，朝鲜也费了20多年的力量，才达到今天的程度（当时朝鲜学校完全使用日本文字了），‘满洲人’有了台湾、朝鲜作榜样，可能要快一些，说不定再用15年，就可以完成全用日文的使命，我也算是对日满‘一德一心’尽到了力量……”从这些话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和卢大臣是异口同声，唱一个调子，在为积极推行学校的奴化教育卖尽力气。图书会社除了印刷出版教科书外，还要出版《新满洲》、《麒麟》等刊物，以达到其营利目的的。主要编辑人是荣孟枚。刊物中的封建毒素较深，搬弄孔孟经典，介绍日本的维新文明，鼓吹“王道乐土”，宣扬日满“一德一心”的“建国”精神。尽管订户不多，可是出版数量并不少。

从以上列举事实中，不难看出伪满日伪统治者一唱一和，配合默契，积极贯彻其奴化政策，为进一步加深伪满洲国的殖民地化打下基础。

（摘自《四平文史资料》第一辑）

我在长春市自强学校校园生活片断

裴素云

长春市自强学校（现在长春市自强街小学前身）是1915年由长春市实业家裕昌源经理王荆山出资，借用东大桥附近的山东会馆兴办的。1918年又增招初中班。1920年于马号门外新校舍建成（现在第七中学校址），便将学校迁入新址。他聘请杨世桢为校长，对学校加强管理。杨世桢号“维周”，磐石县人，自幼家贫，刻苦读书，学品兼优，在吉林省立师范毕业后，曾留

学日本，约于1926年前后到自强学校任教。在此期间制定了校训“自强不息”，又制定了校歌，歌词是“自强不息法天行，丕基肇五公。桃李花，溢都城，玉琢白山璞，珠含黑水盈。山高水长，努力前征，中华之光荣”。“九·一八”事变后，他把最后一句改为“新京之光荣”，但是师生都不歌唱，自然地唱成“自强之光荣”。

由于王荆山出钱资助，学校规模不断扩大，又不惜重金聘请高质量的教员，学校办得很出色，在东北三省颇有名气，社会上一致反映自强学校治学严谨，校风校纪严正，学生一律着黑色立领制服剪平头，不许留分头（初时只收男生，不收女生）。一些达官权贵、社会名流、富豪士绅，纷纷将子弟送入该校，王氏家族亲属也多在该校读书。学校确实培养出一些人才，现在自强的老校友遍及海内外，有许多在欧美港台，他们对母校念念不忘。1987年旅居海外的张学文先生（张学良将军的堂弟）与其夫人王文瑞女士（王是王荆山的侄女，王荆山弟弟王焕卿的女儿），回国到天津探亲，由张学思夫人陪同，千里迢迢来长春自强小学访问。

我于伪满初期，曾在该校高小读书，毕业后升入伪新京第一女高（初、高中）学习，后又升入师道科，毕业后又回到该校当教员。经过伪满、国民党时期，直到解放后1950年8月调离该校，仅就回忆的学校生活片断，略述于下：

一、伪满初期

1935年冬我于伪新京第十六校（西二道街小学）初中毕业，1936年春季开学考入自强小学高小教书。“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渐渐伸入教育领域。为便于统治，把全部学校收归公办，这时自强学校已取消中学，改成“新京特别

市立自强两级小学校”（初小、高小），隶属于伪新京市公署教育科管辖。杨世楨仍任校长，教务是宋景春，宋也是长春市很有名气的教师。王荆山在师生中仍有影响，都称他为“校董”。学校规模很大，有本校和分校：一、二年级在分校（现在自强街小学校址），本校是中、高年级，绝大多数班仍在本校（现在七中校址），院内共四栋砖瓦结构教室约数十间。校庭十分宽阔，有操场，篮球、网球场，各种运动器械如肋木、横梯、单杠……庭内遍植杨、柳、榆树，西侧有一座木结构凉亭，供师生歇凉休息，环境十分幽美。校庭南端建有汉白玉石碑一座，是表彰王荆山之弟王焕卿办学的功绩的。因王荆山忙于经商，后来把自强学校交给其弟王焕卿管办，我入学时大家还称王荆山是“大校董”，王焕卿是“二校董”。

伪满初期，日本人为了粉饰天下太平，宣扬王道乐土，学校虽改成公办，各校还是按旧的教学制度上课，课程设置变动不大，只是增加了日语课，课节不多，把“党义”换成了“修身”。当时郑孝胥任“国务总理”，一些满清遗老遗少提倡尊孔读经，高小国文课本是文言文，还学《孝经》、《论语》等，作文也要用文言。例如1936年全市高小学生会考，作文就出了一个“五道之本在乎忠孝”的题目，真是难煞了十几岁的小学生。班级编排名称也是按孝、悌、忠、义、礼、义……我是在高一孝级。据说我们班如果按建校时延续下来的班次应是高二十四班。全校女生不多，我们班只有十来名女生，级任刘德权，是一位十分俭朴正直的夫子，总是穿着一身洗得已褪了色的蓝制服，足登一双家做的圆口布鞋，说话有点口吃，教课却十分认真，对学生既严格又热情，除体育、音乐、日语外，各科都由他一人包教，每门课程都是十分耐心细致的讲授。当时很重视毛笔字，课表内不仅有大楷、小楷等，作文也要使用毛笔小楷

书写。刘老师批改得很精细，用毛笔沾着一个大贝壳中研好的朱墨圈圈、点点，眉批、总批，好的句段都圈点出来，真是一位诲人不倦的好老师，至今仍令人怀念。

学校生活除每天上六节课，早晨要举行“朝会”。第一堂课，全体师生齐集操场，值周教师对学生“训话”后作“建国体操”。学校还办了校刊，由老师组织一伙高年级爱好文艺的学生自己办，每期出刊张贴在校门迎面房山头上，学生都兴致勃勃地投稿。全市每年组织一次“会考”，各校选拔数名成绩优秀的学生参赛。自强的学生，大多是名列前茅。

到了冬天，校庭内浇冰场，许多富家子弟，纷纷买冰鞋练习滑冰，学校规定不穿冰鞋不许上冰场，一些贫苦学生，眼看着同学们在冰上奔驰飞舞，羡慕已极。最令人气愤不平的是虽然没冰鞋不许上冰场，却同样要担当清扫冰场的任务。不知哪位好心人，趁浇冰场之际，暗中偷偷地把冰场围堰捅开个大洞，水流出来冻了条长长的冰趟子，我们这些没冰鞋的学生，也有了打“滑脱溜”的机会。

最使我印象深刻，感到十分有意义的是学校组织一次去吉林旅行。游览了北山、小白山、龙潭山、圣母洞……那时龙潭山很荒凉，古木参天，杳无人烟，据说还时有土匪出没，为了安全，学校特请了警察保护。

伪满时期有几个节日学生必须参加：

1. 建国节：每年3月1日是伪满洲国“成立”的日子。在大同公园（今儿童公园）举行仪式。唱伪满“国歌”，“国务总理”大臣“训话”，春寒料峭，天气很冷，学生们站一会儿便挺不住了。

2. 万寿节：伪满皇帝溥仪的生日是旧历正月十三日，为了表示普天同庆，晚上举行提灯会，小学高年级以上学生参加。学

校发给每人一个圆型的小纸灯笼，两支小蜡烛，由老师领着到伪皇宫前去参拜。大家排着队在伪皇宫前广场等着。据说溥仪站在墙内探出半个身子，向人们致意，天黑什么也看不清，学生们盲目地跟着三呼“万岁”后就解散回家。

3. 春秋丁祀孔：伪满初期学校最隆重的活动是参加春秋两个丁月的祭孔。在溥仪登极前，祀孔由“国务总理”郑孝胥主祭。1934年即伪康德元年，溥仪登极后，遇到第一次秋丁祀孔，他要亲自当主祭官，就使这一年的祭孔仪式非常隆重。据说文庙小学（现在东二道街小学）从暑假开始就参与准备工作。选派学生当歌生、舞生进行练习。到了祭祀那天，文武官员以及参加祭祀的人，都穿着蓝袍子、青马褂、头戴圆帽头，歌生、舞生、乐生也都穿特制的古式服装，脚穿靴子，采取古时祭孔仪式，旌旗匾伞仪仗队。祭品除特制的供果外，还有三牲，整猪、整羊各12头，牛1头，都是屠宰后的白条，架伏在大成殿及东西庑（两侧厢房）前，参拜者一律行三拜九叩大礼。我们学生每年参加祭孔看不到这样场面，在庆典后，各校学生在老师率领下，列队到文庙大成殿前，行九十度鞠躬礼，大家对殿前陈设的猪、牛、羊很感兴趣，据说祭孔完毕，校长还能分到一块肉呢。

1937年，自强校内轰动最大的事件是校长杨世禎之死。杨校长因患盲肠炎（阑尾炎）入新京市立医院（现医大二院址）手术而死。他年龄不算太大，平时身体也很健壮，病情又不复杂，市立医院是新建的，设备齐全，很多日本医生，医疗水平较高，杨校长便是经日本医生做的手术，居然致死，不能不令人怀疑。传说是医生马虎，落在体内一个止血钳子感染致死，更多人怀疑是日本人故意害死的。噩耗传来，全校师生大为悲恸，社会上震动也很大。杨校长在学校终生任教，十几年惨淡经营，用

心良苦，培养人才，在教育界德高望重。为悼念他，在校内高搭灵棚，大办丧事，各界吊唁者络绎不绝。学生也派代表参加了吊唁，并宣读了祭文。为了表彰他办学的贡献，在校庭南端西侧立了一座半身铜像，学生每天进校门先向王荆山铜像敬礼，再向杨校长石碑敬礼。杨校长逝世后，任命宋景春老师当校长，我于1937年冬高小毕业，离开了学校。

二、伪满后期

1942年12月，我于伪新京第一女高师道科毕业，翌年1月，分回到自强国民优级学校教书。这时帝国主义对教育的统治已达到白热化程度。首先是学制大改变，1937年颁布了“新学制”法令，初小改为国民学校，高小改为国民优级学校，中学改为国民高等学校（初、高中共四年毕业）。师范教育分师道大学和师道学校。师道学校分本科、特修科，本科招收国高毕业生学习一年毕业，任二等教谕（相当于甲种委任官），特修科招收小学毕业生学习两年毕业，任教导（相当于乙种委任官），还有教谕，是文化业务低，不够级别，不在官吏之列。资深的校长，还有荐任官，穿高级面料的“协和服”，举行仪式时胸前佩带一条黄色绶带，表明官阶。

课程设置、教科书都彻底改了，增多了日语课时，增加了“建国精神”，该课程都是宣传“日满亲善”、“一德一心”、“共存共荣”的内容，直接由校长或教务主任讲授。取消了国文、历史、地理、自然等科，改成“满语”课，教材是一本杂七杂八不伦不类的大杂烩，每课少则几页，多则几十页，学生根本学不到真知识。尤其是派来了日本人统治学校，各校都增加了日本教师，每校都有一名日本人任“首席”（相当于副校长），中国校长只是一个牌位，大权都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当时学校校

长是孔庆春，虽然资深，在教育界颇有声望，也得听“首席”斋藤的。孔校长于1944年调走，调来了日本人竹内任校长，他土里土气根本不懂教育，师生给他起了个“绰号”，背地里叫他“老土豆子”。

各种活动也都渗透着奴化教育的色彩，如每天上课前师生齐集操场，举行“朝会”，首先向“皇宫遥拜”，面向东方向日本皇宫敬礼；再进行“帝宫遥拜”，面向伪皇宫方向，向伪满皇帝敬礼；然后齐声背诵《国民训》，最后再作“建国体操”。每天中午12时，全市统一鸣汽笛，师生起立、立正（无论在教室或操场）低头“默祷”，祈祷“日本皇军武运长久，大东亚圣战胜利”。大家在心中暗暗咒骂日本鬼子快快完蛋。遇有举行仪式，校长还要宣读《回銮训民诏书》。这是溥仪于1935年4月为了报答其主子动身访问日本，回来后颁布的“圣旨”，要全体国民必须与日本“一德一心”、“共存共荣”，每校有一份，平时供奉在特制的“神龛”里，举行仪式时，由校长捧出宣读，全体师生都要立正，低头恭听。

这时的自强学校仍有分校、本校两处。校址规模很大，教职工很多，是国民学校和国民优级学校的两级小学。在长春市很有名望，记得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的小儿子七少爷一年级也在该校就读。每天上学有两仆人（一男、一女）陪护。

到了1944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已到穷途末日，学校里充满了恐怖气氛。为了预防空袭，教室门窗玻璃贴满了“米”字型纸条，校庭内挖了很多防空壕，师生一律着“防空服”，男的必须戴战斗帽，打绑腿，女性着黑色紧袖紧腿的防空服，每人必须带“防空袋”，内装防空帽、三角巾、白毛巾等以防防毒瓦斯和临时救护之用。也经常进行防空演习，听到防空警报（鸣汽笛），立即整装进入防空壕内避难，整日人心惶惶不

能安心上课。

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日伪的白色恐怖统治愈来愈严重，在警察署、宪兵队、“思想矫正局”、“指纹管理局”等众多的特务机关里，有很多老师被认为是反满抗日的“思想犯”，动辄被抓去严刑拷打。我也曾被列入黑名单，在被监视之列。1944年冬，在我带学生外出参观之际，几名特务来校搜查了我的办公桌，虽没找到可疑证据，但并没因此罢休。数周后日本特务又把我叫到校长室进行长时间盘问，终因无确凿证据，才免除一场灾难。那时的学校教师均惶惶不可终日，经常有人被以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抓到宪兵队严刑拷打，灌辣椒水、过电。听说我的一名同学，新婚之夜即被抓走。我被迫于1945年7月编造了个辞职结婚的理由，离开了我心爱的学生和热爱的教育事业。

在桦川国高尝受的奴化教育

董 琦*

一、他乡求学 事与愿违

1943年（伪康德10年）冬季是日伪当局强制实行“粮谷出荷”的第三个年头，老百姓已经没饭吃了，我却刚好读完了汤原县国民优级学校，论年龄刚满13岁。我父亲是个农民，家里没钱，不能让我闲在家里白吃饭。可是，一个13岁的孩子又能

* 作者曾任佳木斯市委宣传部部长，现任佳木斯市政协主席。

干点什么呢？想来想去，还得读书。我自己也多次想过，吃苦算不了什么，只要多读几年书，将来成为“人上人”，就可以不受汉奸、警察和绅士们的窝囊气；要能做点“大事儿”，赶走日本人，还能光宗耀祖呢！就这样，我在父亲的支持下，下决心报考国民高等学校。

那时候，汤原县城里没有中学。在伪三江省内，原来只有三处国民高等学校，一处设在佳木斯，另外两处设在依兰县城和富锦县城。这三处学校规模较大，历史较长，找不着“门子”、“窗户”的穷学生，要想考进这些学校实在不那么容易。刚好，伪三江省在悦来镇新设了桦川国民高等学校，于1943年（伪康德10年）冬季招收第二期新生。学校新办，地方偏僻，报考的人数不算太多，考取希望较大。这所学校对我来说，尽管远离家乡200余里，不如佳木斯和依兰那样就近方便，但是为了能够考取，还是去悦来镇好些。再说，说不定那个地处偏僻的学校，日本人的统治会差一点。于是，我们几个同学相约结伴，坐火车到佳木斯，再徒步走到悦来镇，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报考了桦川国民高等学校。走路，考试，六七天的时间，留给我的记忆只有一个字：冷。

当时值得庆幸的事情是我被录取了！那是很兴奋的，心里泛起了许多笼统的幻想。1944年（伪康德11年）春节过后，我辞别父母，离开家乡，到桦川国民高等学校去报到。可是，我一到就感到了完全失望。新、老学生加一起三个班，每班50人，教职员中的日本人就有三名，校长名叫田口三郎，教导主任名叫太田敏雄，还有一军事教官也是日本人。一个个骄横粗暴，“武士道”精神十足，完全没有教育家的风貌。校舍倒是新建的，但是取暖设备很差，坐在教室里干挨冻。而且那时候的建筑施工不讲“工完场清”，院里院外，房前屋后，到处是砖头瓦块，

废土成堆。学校当然是不会雇人清理的，三个班的学生得用多长时间才能干完这些活儿呢？还能上课吗？

失望、沮丧，就是我考入桦川国民高等学校后的第一感。

二、饱受奴役 饥寒交迫

我在桦川国民高等学校读书的头一年，从1944年3月正式开学到同年12月结业，真正坐下来上课的时间至多不过5个月，其余时间尽是没完没了的体力劳动。被迫的体力劳动，尤其是吃不饱饭，还要强打精神硬干，叫它是奴役倒更为合适。

桦川国高强迫学生劳动，算起来有许多名目：清理校园，耕种实习地，“勤劳俸仕”，甚至给汉奸地主去铲地、割地，据说这都是为了“支援圣战”、“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日本校长“训话”时还说：只有勤劳的汗水，可以汲取理智和知识。于是，从清理校园开始，干起了奴役式的体力劳动。当地的天气，3、4月间校园的土地尚未解冻，我们这些学生便抡起大镐，挥动铁锹，抬上土篮子，清除砖头、瓦块，平整一堆一堆的基建残土。干累了，想要休息一会儿，可是冷风刺骨，实在难耐，只好咬牙干下去，用汗水热热身体。砖头、瓦块还没清理干净，又让我们修筑围墙，挑冷水合泥浆，好不容易砌成一点，校长一看不合格，又推倒重来。捱到5月份，大地解冻了，耕种实习地也成了经常性的劳动。送粪、刨茬子，人拉犁杖开地垄。春耕不久便是夏锄，一个学生一条垄，谁也别想找轻快。我们几个年岁最小的同学干不动，没到地头就晃儿，还要受到并无恶意的奚落。有人编个顺口溜：“张克让，姚兆和，董玉春，周玉琢，大脑袋，小细脖，光吃饭，干不动活儿。”这里说的董玉春，就是我的原名。要说最苦最累，还数秋收背庄稼，实习地在悦来镇的西门外，往返一次10多里路，我这刚满14岁的瘦小学生，

每背一次都是汗流浹背，频频停下来喘息不止。有一次，我背着庄稼刚刚走到城门口，突然眼冒金花，眼前一黑便摔倒在地上。大同学看不下去，替我背回了那捆庄稼。别的劳动，我这里就不细说了。总之，那年春、夏、秋三季，除了雨天之外，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被奴役。冬天上课的时间多点，但是要在教室里干挨冻。14岁，是少年学生的黄金时代，而我的黄金时代却是在被奴役的劳动中度过的。

吃得饱、穿得暖的时候，人的自觉劳动当然是美好的。问题是我们这些学生一个个饥寒交迫。桦川国高的住校生，几十人住在一个四面土炕的大宿舍里。土炕不烧火，一年四季除了“三伏”天而外，即使是春暖花开的时候，一进宿舍也感到阴森森、冷嗖嗖，没有一点暖和气儿。特别是一到冷天，铺底下一层谷草，身上一床小破被儿，成宿“当团长”——直不了身子，同学们被逼无奈，总是和邻铺的学生合起来睡，合盖两床被，互相依靠着，借取对方的体温，否则就无法入睡。伙食呢，口粮实行“配给制”，早晚两顿喝稀粥，一人只能喝一碗，不是高粱米就是大糠子，而且带糠皮儿。只有中午那顿饭可以吃干的，还有一碗白菜汤，汤里有几块豆腐、土豆什么的。有些外向型的同学，不厌其烦地叨咕着一句话：“日本人吃高粱米——没法子！”事实上日本人还是吃大米的，同学们这样说，不过是借用当时流行的一句歇后语，吐露一点心中的不平而已。

在生活上给我留下最深记忆的，是当时总盼轮到自己担任“食堂值日生”的日子。到那天，可以和另一名同学一起抬个水桶，到豆腐坊去抬豆腐。临走时，从食堂抓一把咸菜或咸盐，回来时慢慢走5里多路，边走边吃，有时即或是顶风冒雨，那又白又嫩的大块豆腐填饱了肚子，也是感到香甜无比的，仿佛世界上所有的美味佳肴也都不过如此。

饱受奴役，饥寒交迫，这就是桦川国高学生所能受到的基本训练。今天想来，这恐怕不能视为日本人校长田口三郎先生个人的“德政”，应该说这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学生实行奴化教育的必要手段。

三、有书难读 有口难言

桦川国高在强迫学生劳动之外，毕竟还有将近一半的时间是要上课的。那么，上课又是怎样安排的？据校方宣布，在四年制的全部课程中，有语文、数学、理化、作物（即农业课）、音体美和军事课，也许还有历史、地理（记不准了），似乎也是应有尽有，事实则不然。大量的基础知识被砍掉了，数学课是被简化得无法再少的代数和几何，物理、化学变成了粗浅的自然常识，历史、地理没开课。与此相反，最惹同学们反感的日语课却占全部课时的三分之一，而尽人皆知的高粱、谷子作物生长一类的农业课又是每周都有。我在桦川国高读书一年半，当时便觉得有书难读，过后想想更觉得什么也没学到。

这里有必要讲讲当时的日语课。如果把日语当作一门外语，当作学习外国科学技术或进行国际交往的工具，那当然是完全必要的。而我们当时学日语，是当作“满洲国第一国语”来学的，日本侵略者企图通过日语课把中国学生变成“二鬼子”。正因如此，日本校长亲自讲课，一个单词重复多少遍，清音、浊音都要严加区别，学错一点便要遭受辱骂，甚至拳打脚踢。学校还有一项规定，在校学生从二年级以后每年都要参加一次伪政府组织的“语学检定”（即日语等级考试），达到三等以上水平的发给等级合格证书，承认翻译资格，升学、就业可以优先，工资之外还可以按月领取“语学津贴”。然而，多数同学对它不感兴趣，私下里说：“日本话不用学，过了三年用不着。”就是

出于这种本能的抵触情绪，同学们在学日语的时间里坐在课堂想别的。所以，我那一年半的时间也白白放过了，现在连日语字母都认不全。

饱受奴役、饥寒交迫而又有书难读，同学们自然是满怀怨气，愤愤不平。然而，那时的学校生活阴森恐怖，谁也不敢随意说话，有口难言，装哑巴最为安全。值得说明，日本侵略者在禁锢学生思想方面确有一套办法，其中，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至少有这样三条：

一是强塞硬灌。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已面临彻底失败的绝境，但仍幻想着征服人心，以便长期霸占我国东北。在桦川国高，每天早晨都要把全校师生集合起来，先向皇宫（即向日本天皇）遥拜，再向帝宫（即向伪满皇帝）遥拜，然后唱日本国歌和伪满国歌，背诵《国民训》。所有这些，并非仅仅是一成不变的仪式，而是一种“忠诚训练”。这一套顶礼如仪之后，日本人校长还要进行“训话”，吹嘘“日满亲善”、“大东亚圣战必胜必成”，要求学生“养成中坚国民”、“循规蹈矩”，不许“胡思乱想”。这些骗人的鬼话，不管你如何厌恶，还是每天听一遍。同时，在教室，在宿舍，墙壁上总是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除了重复那些欺骗性的宣传口号之外，就是警告学生“莫谈国事”、“守口如瓶”。这是日本侵略者禁锢学生思想而强塞硬灌的反面补充。

二是制造分裂。日本侵略者把法西斯式的“阶级服从”强加在中国学生身上，让上班生任意体罚下班生，达到他们分裂学生的目的。我刚到桦川国高入学的第一天，学校没开课，跑到悦来镇街上逛了一圈。当我走回宿舍，刚一进门，就有一个上班生打了我两个耳光，打得我懵头转向，还不知为了什么。打完了，他才大喊大叫地说：“你，在街上见了我为什么不敬礼？

你还哭？委屈吗？委屈了，再打你两下！”幸亏一个上班同乡从旁讲情，这件事情才算结束。从此，在我心里不但对这位上班生埋下了对立情绪，对其余上班生也产生了警惕心理。因此，我在那一年半的时间里，除了对个别十分要好的同学之外，轻易不敢说点心里话。其他同学，我看也都差不多。而且常遇到这种情况：当一个同学说话稍有不慎之外，就会有另一个好心的同学从旁制止，奉劝他“少说两句吧，没人会把你当成哑巴卖了”。

三是使用暗探。日本侵略者在学校里使用暗探是十分隐蔽的，可不像后来听说的国民党的特务那样公开。桦川国高的学生、老师，有的一本正经，不苟言笑，对日本人校长、教导主任和军事官敬而远之；有的爱说几句日本话，对那几个日本人表现为恭顺，甚至是逢迎，也许还是表面现象；还有的当面点头称是，背过脸去就骂娘，而内心里想些什么，别人也无从了解。但是，确实有暗探。有一位名叫李干（干字读甘，原是繁体字，这里从简）的老师，当年30多岁，中等身体，敦厚朴实，治学严谨，据说在课堂上说了一句真话，“日本人侵略中国，我们都当了亡国奴！”当时并没有日本人在场，可是事后却被一群全副武装的警察、特务从课堂上给抓走了，事后杳无音信，生死不明。这件事完全暴露了日本侵略者的狰狞面目，也告诫全校正直的师生，那里确实有暗探。

日本侵略者就用这套办法来禁锢学生的思想，不准你说出半句真话。在桦川国高，既让你有书难读，又使你有口难言，这便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学生进行奴化教育的主要方面。

四、苦尽甜来 长记过去

1945年（伪康德12年）入春以后，桦川国高表面上还是种

地、铧地、“勤劳奉仕”，没完没了的劳动周而复始。对学生的思想禁锢依旧严严实实，以致希特勒垮台，日本广岛挨了原子弹的轰炸，这样的国际大事都没人了解。然而那年征兵的日期提前了，日本“在乡军人”纷纷应召入伍，日本人露出了愁眉苦脸。这时候，我们这些受够了奴役之苦和思想禁锢的青少年学生，预感到日本侵略者要“完蛋”了。

1945年8月13日，苏联红军的炮舰从松花江逆流而上，开过悦来镇，开进佳木斯。往日不可一世的侵略者，这时狼狈不堪，逃跑的逃跑，被俘的被俘。日本侵略者企图训练成奴才的青少年学生，如同出笼的小马，一个个欢呼跳跃，欣喜若狂。

现在知道下落的几位同学，郑艺钟、程启徽、姚岚、黄宝祥、邹凤岐等等，在党的培养下，有的当了大学教授，有的在党政机关作了领导干部。这些人聚首忆旧，对那段学生生活总是记忆犹新，不能忘怀。

（摘自《佳木斯文史资料》第七辑）

日伪统治抚顺时期的奴化教育

姚云鹏 李凤侠 王成璞

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抚顺地区就已沦为日军的殖民地。当时抚顺市区（今东西一路至东西十路）均为“新站”，属于日本租界地。因此在抚顺矿区租界地内施行的教育，实际上就是殖民地教育，亦即“奴化”教育。

当时在抚顺地区仅设有“满铁”抚顺公学堂（今西十路三十二中学）一所，小学六年制。所学课程，以日语为主，体练、

劳动等次之，专门培养为满铁抚顺矿服务的廉价劳动力。在抚顺公学堂毕业后，还可升入高一级的抚顺炭矿学校，其文化程度与抚顺工科国民高等学校略同，除日语等必修课外，尚有技术专业课程，给抚顺煤矿培养较高级的驯顺奴隶。

1931年“九·一八”事变，翌日日军侵占抚顺。日本帝国主义在抚顺的当权者，将曾在抚顺公学堂任教的“满系”（中国人）教师冯焕章调到抚顺县教育局当视学，不久即提升为县教育局局长（县街合一）。冯焕章上台后，即秉承日本主子的旨意，把日本法西斯办公学堂推行奴化政策，实行奴化教育的那套办法，在抚顺县内推行开来。

一、通过“朝会”天天进行奴化教育

日本帝国主义者精心策划的奴化政策与愚民政策，是一对孪生姊妹，奴化青少年学生是基础，同时奴化成年人，全面灌输反动思想，取缔自由，摧残身心。

当时学校每天都要上“朝会”。第一项先“向东京遥拜”，即向东京的日本天皇遥拜；后向新京遥拜，即向长春的傀儡皇帝溥仪（康德）遥拜。第二项是“默祷”，即在默默中为侵华战争中的炮灰，所谓“忠灵”祷告默哀。第三项是唱“国歌”，即1934年（大同3年）3月1日“建国大典”所公布的《满洲国歌》：“天地内，有了新满洲，新满洲，便是新天地，顶天立地无苦无优……”1941年以后，又重新公布了国歌，内容则是“神光开宇宙，表里山河壮皇猷，永受天祐兮，万寿无疆渤海讴……”词中的“神光”原句，指的是日本天照大神开创了宇宙世界，在天照大神的保护下，渤海之内齐声讴歌“万寿无疆”。这首所谓的《满洲国歌》，简直成了日本国歌。那些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就这样天天唱下去，长此“奴化”，怎能不使学生们把伟大的祖

国淡然忘却？第四项是宣读“诏书”（1941年12月8日，日本帝国主义偷袭珍珠港，溥仪颁发《时局诏书》）。在机关学校“朝会”上，经常宣读的是康德皇帝的《回銮训民诏书》：“朕自登极以来，亟思恭访日本皇室，修睦联欢，以伸积慕。今次东渡，宿愿克遂……”读“诏书”的人，态度要毕恭毕敬，如在机关必由机关之长宣读，在学校则由校长宣读。宣读“诏书”者，必须身穿绿色“日满协和服”，系黄礼带，戴白纱手套，“请送”“诏书”目不斜视鞠躬四十五度。就是日本人读此“诏书”，即使装腔做势，也必须按此礼仪行事，以达到奴化“满洲人”的目的。

1941年（康德8年）以后，日本帝国大本营，以“满洲国政府”之名，又颁布了一项“奴化政策新措施”，即臭名昭著的《国民训》。机关、学校每天都要在“朝会”上逐条、逐字用日语集体背诵，其要旨无非是迫使人们“崇敬天照大神，忠诚于皇帝陛下”。当时“满洲人”路过东七条通（今东七路团市委前路口）的日本神社，哪怕相距500米，也得行九十度的敬礼，不然一旦被路北的日本警察分所发现，就要受严厉的处罚。总之，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各种手段，贯彻“奴化政策”，妄图把“满洲人”培养成他们的忠实驯顺奴隶，能按其意志行动的机器人。

1941年12月8日，英、美对日宣战，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则称“大东亚战争”，于是对东北人民的奴化教育，日益加剧。为了建设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共存共荣”，傀儡皇帝溥仪又颁发一道“诏书”。原来承认日本帝国是“满洲”的“友邦”、“盟邦”，这次而升为“亲邦”。顾名思义，“友邦”、“盟邦”还得说是“平等友好”关系，而“亲邦”就成为父子关系、君臣关系了，即臣必忠于君，子必孝于父。君叫臣死，臣

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父邦”说什么就是什么，要什么就得给什么，必须绝对服从，丝毫不得违背。日帝不仅大肆征兵、抓劳工，要“勤劳奉仕”、强迫“出荷”，就连小学生们也要在限期内，完成繁重的征集任务，如让他们采集山葡萄叶，向他们征收猪血、牲畜皮毛、洋麻、蓖麻等等军事物资。

二、通过教材进行奴化教育

教材是教育思想的体现。日本帝国主义为推行其愚民政策，潜移默化地毒害青少年一代，非常注意教材的编写。伪满政府命令把语文课改为《满语》，修身改为《国民道德》，地理改为《满洲地理》，历史改为《满洲历史》。孩子们一入学，就对他们进行爱“国”教育，要他们认识伪国旗，“国旗扬扬扬，红蓝白黑满地皇……”（初级小学一年级课本）。国民高等学校和国民优级学校的地理教材上竟说：“由地理形势来看，长城是一道横线，内外分开，自古以来，即各有天地。”在历史教材上则进一步说：“从古至今，关内关外均各自为国”，同时举出扶余、高句丽、辽金等例证。很明显，其歪曲历史的目的在于抹掉中国青少年们心灵中的祖国观念，让他们盲目相信自己是“满洲国人”，忠于“满洲国”和日本“盟邦”。

伪满建国以后，奴化教育日趋加深。当时大肆宣传的“建国精神”，即以“王道”为主，“仁义礼让”为先，“满洲国民”必忠于“皇帝陛下”。国民学校后期改编的一年级《满语》课本，第一课是《皇帝陛下》，“皇帝的陛下警察官，有统治满洲国民的至上权……”。《论语》、《孟子》、《孝经》、“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纷纷出笼，充满课本。

为加强日语、体练、劳动三科的教学，抚顺县教育局特增派三名视学委员，各司一科，专职担任巡回督导，以监督“奴

化”教育政策的实施。

三、通过“阶级服从”培养奴性

日本军人奉“阶级服从”为天职，伪满学校的军事教练教学生也是以“阶级服从”为主。教师打骂体罚学生是经常的事。在学生中等级森严，高年级的学生可以打低年级的学生，正如日本兵可以打伪国兵，伪国兵可打伪警察，伪警察可打老百姓一样。那时学校与学校之间，特别是奉天国高在抚顺的通勤生同抚顺国高生之间，经常发生群殴事件。学生在外打了人报告给日本教师，不但不受责罚，还要受鼓励，说是好样的。相反，如果学生在外挨打被日本教师得知，还要被狠狠打一顿。千金寨第九高级小学的童子军，曾用军棍把大同电影院的设备打得稀烂，学生也未受责罚。至于女子比男子又低一等，女子国高的学生，除一般的课程外，还有《烹饪》和《家事》等课。她们不仅要当帝国的驯服工具，还要当男人的奴隶。总之，从学校到社会直到家庭生活，都极力灌输等级观念，使“满洲人”成为毫无反抗精神，只会服从恭顺的奴隶，以维护其法西斯统治。

四、监督训练教师 贯彻奴化政策

日本帝国主义者深深懂得，贯彻奴化政策，必有一支适应的教师队伍。当时，伪满洲国新培养出来的教师为数很少，而留用的教师，又多思想“陈腐”、“对满洲教育方针反应迟钝”，于是采取两种办法：一是重点学校改设国民优级学校，周围学校都归其领导。本校有日系教师驻校，虽名为教师，实际上掌握全权，还负有监视“满系”教师言行的任务。“满系”校长和教务主任有苦难言，如果事事请示日系教师，他认为你是窝囊废；如不请示又说你目中无人，大发雷霆。二是设师道训练所，

根据推行奴化教育政策的需要来培训教师。在新京设立中央师道训练所，培训“全满”师资，其学员为各省、市、县选送的青年教师，时间为5个月，结业升任一级教谕（委任官）；在奉天设立地方师道训练所（附设省立师道学校），任务是轮训全省教师，主要是训练如何灌输奴化教育思想，时间也是5个月。学科以日语为主，“体练”、“口语”和“建国精神”三科为辅。教官均为日本现役军官。在训管方面十分苛刻，教官时常责骂学生，教官一发怒，就罚全体学员跑步，让学员绕400米的操场跑16到20圈，常有一些体弱的学员晕倒在操场上，学员们整日里提心吊胆。

日本帝国主义为加强奴化教育，还向各省、市、县机关、学校派日系官吏做副职，掌握全权，任正职的“满系”官员没有任何实权。如中和国民优级学校（今之十七中学地址），就派来一个叫竹滨的日本人做副校长；亲仁国民优级学校（今大官屯小学处），就派来一个叫久助的日本人做副校长；抚顺工科国民高等学校校长是日人权藤丰藏，训谕主任先后由日人野月浩和川村力卫担任。各校日系校长、主任有权监视、体罚“满系”校长和教师。工科国高电气科班主任赵荫兰（哈工大毕业），就曾被川村力卫打过耳光，罚过跑。原因是赵和学生曾谈论电影《夜半歌声》插曲，解释过“管和那封建魔王抗争”这句歌词，于是被扣上“政治嫌疑”的罪名，身遭凌辱。同时，奉天军管区还向各国民高等学校派遣现役军官，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以做为补充伪满陆军的预备力量。抚顺工科国民高等学校先后有伊东染二（骑兵少校）、白焕章（陆军中尉）、王兆渭（陆军少校）任教官。另一方面，还从市县各机关单位、企业、商店选择一部分适龄健壮的青年，分期到“青年训练所”（今十九中学西侧）进行军事训练，由现役军官任教官，每期半年至一年。征

兵不合格的“国兵漏”，要参加“勤劳奉仕”，白白干活，不给任何报酬，稍有“越轨”，即遭受严厉的惩戒。

日伪统治十四年期间，在奴化教育政策下，抚顺出现了大批文盲，小学毕业生很少，一般人家供出个小学生，就算是出个秀才了。那时全市只有两所国高，直到1944年，才新增一所林科国高，可见受到中等教育的人就更是微乎其微了。

（摘自《抚顺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

一个伪满学生的回忆

齐德满

我出生于1926年，6岁随父母从辽宁老家来到黑龙江铁岭河青梅村，家庭以种地为主。伪满时期，因为家穷念不起书，整天帮家里做农活、放猪、采猪菜。我在野外看到村里孩子背书包上学，心里又难过又羡慕。1940年春，在我的央求下，通过亲戚的资助，我才上了青梅村小学一年级，这时已经15岁。我当了学生，心里好高兴，由于刻苦用功，两年学完了初小的课程。1942年春，经老师介绍，又上了铁岭河的培英国民优级学校。以后又在一面坡和宁安的国民高等学校读过书。我的学生生活大部分是在伪满时期度过的，接受的全是日本奴化教育，伪满学生的痛苦，我有亲身感受。

一、挨打受辱的棍棒教育

在伪满，由于日本侵略者奴役中国人民，我们当学生的挨打受辱时有发生。1943年夏，我正在培英校念书，一次上日语

课，日本教师青木压堂（不按时下课），恰巧一个外班下课小学生扒在窗口往里看，我用日语说：“走、走！”青木在讲台上白了我一眼，没说什么。谁知，下课后却遭来一场横祸，原来青木心怀鬼胎，见我年龄大，怀疑我反对他，借机哄他。下课后，我刚走出教室大门，他就凶狠地抓住我，左右开弓打了我两个嘴巴子。这还不算，只见他满脸杀气，又找来一根大木棒，不容分说，朝我的身上和头部猛砸。当时，我两眼一黑，昏倒在地，在场的学生看着也不敢上前拉开，因为日本人青木横行霸道，谁拉谁就挨他打。我清醒后，同学们扶我去找班主任陈宝琦，所有的中国老师见此情景，内心十分气愤，但也是敢怒不敢言。后来又去找校长杜云程，他也是束手无策。当时青木有二十六七岁，在学校老师中他是级别很低的教导，但他是日本人派到学校来暗中监视的，学校的事情由他说了算，校长决定的事也必须先同他商量。铁岭河有日本宪兵队，与青木来往密切，谁还敢惹他呢？我白白地挨了一顿毒打，心里对日本侵略者有着刻骨仇恨。

在当亡国奴的年月，挨打受凌辱的何止我一个学生，又何止是一所学校？1944年，我在一面坡国民高等学校念书时，日本教师打骂学生更是家常便饭。有一次上农业课，教农业的日本教师白尾，在地里监视我们播种大豆，同学们干活很劳累，反感情绪很大。中间乘白尾不在的时候，同学们不给他好好干，在地里挖一个大坑，把豆种埋进一部分，种子少，可以少干点活。有的撒豆种，往垅里撒一大把；有的在垅里不撒种子，以此表示对日本人的反抗，后来豆苗长出时，白尾又带领我们到地里去看，结果怎么样？有的垅一棵豆苗没出，有的长出一大堆豆苗来。白尾在地里什么也没说，把我们全班60来人领回学校操场，排成单行，拉开距离，让全体九十度大弯腰。他拿起一个

大棒子，往每个人的屁股上狠接一棒，以示惩罚。打累了，中间还歇一歇，嘴里骂着。记得站在头前两个同学没有挨打的思想准备，结果被这突如其来大棒子打趴在地，脸擦破，鼻出血。我们心里开始紧张，硬着头皮等着挨揍。这一天中午，学校不给我们饭吃，饿得好难受。

二、奴化教育的精神枷锁

我们在伪满花钱上学念书，根本学不到什么科学知识，无论小学还是中学，日语、国民道德、农业劳动、军事训练等课程占主要地位。还迫使学生背诵伪满皇帝“诏书”、“国民训”，参加朝会、周会、勤劳奉仕等各种奴化教育活动，这些内容都是日本人实施奴化教育的手段。他们天天宣扬的是“日满亲善”、“日满一德一心”、“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等一套，搞得脑子发胀。日本人不叫学生学知识，因为学生明白了道理就会起来反抗他们。因此对学生实行愚化、奴化政策，以同化东北青年学生，培养为他们服务的驯服奴隶。

我在一面坡国高读书时，那里的校长和教导主任全是日本人，还有几个教师。学校名义上是国高，实际上是农林学校，大部分时间参加劳动实习。除了种地，还得护林防火，只有在下雨天才能上课。所以，发的课本一学期学不会，学生基础课的成绩非常低劣，对奴化教育心怀不满。我们班有个同学名叫南立德，是上一班降下来的，主要是日语不好，为此，他非常气愤，说：“我不学那玩艺儿，愿咋的就咋的。”致使他一再降级。日本人教师本身文化不高，只起特务作用。白尾在国高教农业知识，其实他什么知识也没有，只是领着干活，打学生，我们背后叫他“白猪”、“蠢猪”。

我被青木、白尾等日本人打过后，对奴化教育那一套更不

服气。我也不乐意学日语，听说日本兵从东南亚撤退，战局不好，更觉得“日本话不用学，再过两年用不着”。盼望日本人早点垮台。但是不学日语又不行，不会日语不准考学，所以我采取应付，日语考试前复习压题，死记硬背几道题，基本跟上就可以。

三、自残骨肉的等级划分

在伪满的国民高等学校里，日本侵略者极力推行阶级绝对服从的军国主义的法西斯校规，学生不仅要绝对服从老师，而且低年级学生要绝对服从高年级学生。在一面坡国高，学生胳膊上戴有白杠标志，几年级几道杠。低年级学生在街上见了高年级学生要敬礼，否则受任意训斥与暴揍。有的行礼也不成，还可以找别的毛病，如名签歪了，衣扣开了，帽子偏了等等。随便一个借口就可以打骂。有的虽然当时不打不骂，过后到学校把低年级学生找到教室，同样可以拳打脚踢地教训一顿。一面坡国高三年级学生芦明水，经常打骂低年级学生。他个子小，打高个学生不得劲，于是站在书桌上，居高临下，用脚狠踹狠踢。还有四年级的范迪贵，对我们低年级学生打得也狠。1944年夏天军训时，他是行军的中队长，有两个低年级学生背包打得不规则，他竟以此为理由，把他俩打得牙出血，所以低年级学生对他恨之入骨。我那时在校住宿，吃的不好，每次回家返校，总得带些炒面或别的什么好吃的东西。这时，必须先分给同寝室高年级学生一部分，不然会找茬打骂我的。

在奴化教育的毒害下，学生之间是敌对关系，互相仇视，互相戒备，没有什么团结友爱。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宁安国高与牡丹江国高的两校学生打架事件。1945年，我转到宁安国高读书，宁安国高的学生与牡丹江国高学生在火车上发生口角，结

果打了起来，于是两校学生互相打骂，多达数百人，受伤的不少，其中把宁高三年级的学生韩××肋骨和胳膊打成骨折。后来由双方校长出面才平息。日本军国主义的绝对服从的校风，给中国学生制造了内部矛盾，使其自残骨肉，便于日本人的殖民统治。

四、当牛做马的勤劳奉仕

日本侵略者把伪满学生不当人看，而是作为奴隶对待，每年很少时间学习知识，大量的就是勤劳奉仕，强制学生为日本人干活，一干三四个月，甚至半年。我因为在一面坡国高尽干活，有反感，于1945年春天转学到宁安国高，谁知，宁安国高照样强制劳动。我刚来不多日子，学校各年级都分头去勤劳奉仕。我们班50多人，到二道河子钓鱼台村熬葡萄叶子，给日本人做酒石酸石灰（日本人用于飞机涂料），5月份去的，一直干到“八·一五”光复。我们在那里干活，过着同劳工一样的生活，与劳工住在同一工棚。早上天一亮起床，五六个人一组，负责熬一口锅。先把葡萄叶子装锅，添水、加药，然后烧火，把叶子熬成水，把水再熬干，最后熬成粉面子装口袋运走。那里葡萄叶堆成山，都是劳工从山上采的。烧柴都由我们自己上山去砍。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十分疲劳。在工地吃的是大棒子、窝窝头，喝的是菜汤，根本吃不饱。晚上睡工棚，地下潮湿，前半夜蚊子叮，后半夜又冷，生活非常苦。当时领着干活的是体育教师马绍海。“八·一五”光复了，我们在山沟里干活还不知道。后来小火车一停，马老师也没回来，工地上没人管，我们也不干了，步行几十里往家走。走到二道河子，才知道苏联红军来了，日本投降了，我们才舒心地往家奔。

（摘自《牡丹江文史资料》第六辑）

我受伪满“再教育”的回忆

于跃东

伪满对于学校教职员施行再教育，这是伪国既定的方针，目的是为了教职员体得建国精神，了解日满一德一心的实质，很好的为奴化教育服务。我在伪满康德元年（1934年）起到光复前止，曾担任过吉林省立女子国高校长。在这10多年当中，曾受过多次再教育，将短期受训的三次写在下面。

一、派赴国立师道高等学校受训

伪满康德4年（1937年）秋季，吉林省教育厅派我去国立师道高等学校受训，日期为一周，一同受训的全是国民高等学校校长，共20多人。这次受训是吉林省教育厅委托师道高等学校办理，由学校专派坂田学监负责指导。坂田是日本退伍军人，年纪50左右，态度严厉，不苟言笑。他在学校并不教课，专任学监，每天在校监督学生上课，监督学生休息，他和学生在同一食堂用饭，在同一宿舍寄宿，表面是和学生共起居，共作息，其实是监视学生的一切。他对学生管理特别严格，他走在任何地方，学生见他必须举手，敬礼，即此可见一斑。因而学生对他是望之生畏，敢怒而不敢言。我们这些受训人到校后，坂田即给我们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训话。大意是说：你们既来受训，不要以校长身份自居，要做一个寻常小学生。满洲人一些习惯不好，应当向日本人学习。开始即给我们一个当头棒吓。这样我们在受训的一周里，是与师道高等学生共食宿，共休息。规

定每天上午上课，下午受训，其课程由师道高等教员日人须乡主讲，坂田也作两次讲演。他们讲的全是建国精神（须乡有《建国精神》一书），大意是说：满洲实行五道，是皇帝的大理想，从皇帝访日的实现，即完成五道的理想，也就是千古不灭的建国精神。又说满洲与日本是一德一心，一体不可分，永久保持协同关系，并在政治、经济、产业、文化上，要取得协调。在大东亚新秩序建设上，古来圣贤未能实现，而大满洲明显地实现了。这一套生拉硬扯，不但须乡这样讲，坂田也是这样说，可见他们对于建国精神，是一个鼻孔出气。及到下午则由坂田指导我们训练，他的训练，不是讲解，而是实做，把日本女学生所学的“礼仪作法”全盘拿出，让我们样样练习。他特别对于如何捧读诏书，如何参拜御真影（皇帝照片），如何向帝宫遥拜，如何参拜神社等作法，都让我们每个人实地演习，因而花的时间较长。我们最感难学的是不动姿势和举手敬礼，此两种动作，如果谁做得不好，即被坂田加以冷笑，当时受训人很难堪，都说咱们不是军人出身，这个动作，当然做得不好。可是日本人竟给以冷笑，真是对咱们太轻视。本来伪满对于教职员实行再教育，不是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能力，而是把教职员看成无知无识，用一种愚民政策，让教职员服服贴贴供他们驱使，从整个再教育方针看来，即表现这一点。所以我们在受训期间，不是心情畅快，而是闷闷不乐，到受训的最后一天，还让我们每个人作一篇感想文。我倒忘记感想文是怎样作的了，大概是说些在受训以后，得到了收获，并没有敢说出内心不痛快的话。感想文交上后，才准许离开师道学校，算是受训完了。

二、派赴吉林江南工兵营受训

在伪满康德7年（1940年）夏天，我被派到吉林江南工兵

营受训。这一次受训的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全是吉林市中小学校长和一部分教育行政人员，总共40多人。主办这次训练的，是协和会吉林市本部和吉林省民生厅两个单位。在入营受训以前，即规定全部受训为军事训练，所以在事先即通知受训人要做好准备，所带行李要简单，不准携带书物，特别规定要戴战斗帽、打裹腿、扎腰带、穿软鞋。从这种规定看来，即知是一场艰苦训练。及入营以后，才知道这次受训是协和会民生厅委托吉林第二军管区办理，由军管区又交给江南工兵营主持进行。担当指导训练的，是日本福田教官，这位教官身材细长，威风不小，摆出日本军人不可侵犯的神色。我入营当日，不知什么原因，即派定我和第三国高校长赵恭福两人为分队长。派定以后，有些日本人还不满意，认为在受训人当中，有不少是日本在乡军人，而不委派他们，竟委派两个满系校长，真使他们有点不服，但也无可奈何，只好服从。原定受训日为5天，每天上午由福田教官讲述各种军事技术，并讲大东亚战斗情况，还讲日本军队如何精良等等，午后则纯为军事训练，每人发给步枪一支，从基本训练开始，一直做到攻击冲锋为止，把我们训练得筋疲力尽，腰腿酸疼。而一日三餐，又都是高粱米干饭，有些日本人说高粱米饭很香，有的说没法子，吃罢，这倒应合了我们常说的一句俗语：日本人吃高粱米——没法子。其实最困难的是晚上训练，规定每人轮流站岗，在两个小时站岗勤务内，无论在室内或在室外，均须持枪伫立，不得稍有疏忽。我们当队长的，还得查勤，随时向福田教官报告情况。还规定在就寝时，须全脱衣服，不准打裹腿睡觉。如果听到号令，要在5分钟内，将衣服穿好，裹腿打好，否则以违犯纪律处罚。我记得有一天夜里，半夜1点钟左右，福田教官鸣号，所有受训人均在甜睡中惊醒，立即将衣服穿好，裹腿打好，持枪在院内集合，

福田发令说现在江北岸宴楼地方有敌情，赵队先头，于队接后，向敌人前方攻击。我没听清楚是什么命令，遂领着一个小队，本来应当随赵队往西走，而竟向相反方向的东边跑去。在月色朦胧的黑夜里，通过杂草丛生的一条小路，一直跑到江桥的南头。这时我才发现我把路走错了，怎么办呢？只好率队而回，等我到达兵营以后，福田站在门口，大声对我说，你的队不是向敌人攻击，而是见敌人逃跑了。遂即对我大加训斥。本来我的日语是半路出家，没学到好处，这个军事用语，即没听清，也没明白，所以闹出笑话，真是有苦难说。这样的晚上集合，不只一次，真使我这个作队长的，无所措手。受训到最后一天，还开一个座谈会。我是一言没发，回到学校后，更觉这次受训，对我没有什么教育意义。我想一些参加受训的中国人，也会有同感的。

三、派赴中央师道训练所受训

在伪满康德8年（1941年）12月间，吉林省民生厅派我到新京（长春）中央师道训练所受训。这次被派出的，有吉林市教育局长和视学官，还有吉林全省国民高等学校校长，共20多人，其中日本人居多数，中国人是少数。在出发之前，通知参加受训的人，在服装上要穿协和服，戴协和帽，准许穿大衣，惟不准带行李。这次受训是吉林省民生厅请求中央民生部办理，由部里教育司把我们送入中央师道训练所，并把我们这些人组成一个班。我们入到训练所后，即安排在一个宿舍里寄宿。当时每人发给5条毡子，并告诉我说：这5条毡子，是连铺带盖，并无其它寝具。在第一个晚上，许多人是合衣而卧，不敢脱去衣服，因为在零下30多度的天气，睡在板床上，怎能不冷呢。受训日期规定为5天，每天受训，主要是讲课，科目规定为建国精

神、历史地理等课。这些课程用日语讲授，不作翻译。这次训练的目的，是从各科的讲解里，授予伪满的一些知识，从而让日本人了解满洲的事情，好好去干；让中国人换换脑筋，改变思想。所以在每天的讲课里，都着重地说明这一点。当时讲课的多为日本人，我倒记不清姓名了，仅记得有一个教学官和师道的傅教授。我特别对于傅教授记忆较清，因为他是中国人，他教地理课，全用日语讲解，我当时感觉这个人真是了不起的，他讲的是满洲地理形势，对于山脉河流物产等等讲得很清楚，特别对于松花江的流域与东北农业开发上，说得更透彻。讲历史的是日本人，他说满洲地方，不是中国领土，古代为肃慎地，唐朝为渤海国，到了清朝，满族即入主中国。民国时代张作霖占据东北，张死后其子学良继承父业，张学良在东北是横征暴敛，使满蒙3000万民众，过着悲惨的生活。张学良并与南京政府结合，实行排日政策，遂于1931年“九·一八”以柳条沟事件为契机，全满各地举起独立自主的烽火。他把日本侵略东北的野心，全部掩盖起来，这是他们的用意。至于建国精神科，讲得更微妙，说日本占领东北是膺惩军阀，有如古代的吊民伐罪。看来在这5天讲课里，总括其目的不外让我们体得日满一德一心，彻底了解伪满的建国大精神。另外每天早起有集体训练，首先让我们练习跑步，然后练习建国体操。指导训练的是日本人，不记得他的姓名，但记得他身量不高，络腮胡须，身着和服，腰扎裙子，大有日本武士之风。这个训练，需要一个很长时间。在天气严寒的早晨，真是使人感到痛苦。每天晚上要开座谈会，座谈当日的学习心得。还有两天晚上，给我们预备一点吃的东西，这个东西，是用红小豆加白糖，煮成豆子汤，日本人认为很香甜，我们吃着倒不觉怎样好吃，不过在寒冷的晚上，能够吃到一碗热豆汤，也算不坏。惟感觉不好

的是在受训期间，任何人都说天气寒冷。训练所采暖设备不好，我记得吉林同文校长小林、六高校长福太秋，他们每天上课，将毯子围在腿上，以避寒风。我虽没向他们学习，但始终感觉身体不适，并且我的日语本来不好，这次直接听讲，真是有如鸭子听雷，不知他们真正讲些什么。

伪满勃利国高学生的“勤劳奉仕”

苏俊峰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军国主义妄想称霸世界，强行组阁什么大东亚共荣圈，唆使它的喽罗国家为它效命；疯狂地推行愚民政策、灌输什么王道乐土、共存共荣、日满亲善、义勇奉公等奴化思想。用大和魂和武士道精神去奴化、去统治被他们侵占的殖民地人民，为它们搞法西斯侵略扩张去效劳、去卖命。于是就强迫男性青壮年不是去当奴役兵，就是去修工事，再不就是干别的苦力活儿。这，就是他们美其名曰的“勤劳奉仕”。就连国民高等学校的学生，也都以勤劳奉仕为先。

飞机场割草除雪一年不断

飞机场割草除雪，是压倒一切的“学科”，它虽然没有列入课程表内，但任何课节都得给它让路。无论是县公署、警察署，还是宪兵队、西大营，只要来个电话，风雨不误，准时必到。

去飞机场割草的学生还得有个样呢，头戴圆顶大檐儿遮阳草帽，在前面正中帽檐儿上，印着鲜红醒目的“勤劳奉仕”四个大字，左肩斜背水壶，右肩斜挎饭兜，裤腰带上别着雪白的

羊肚儿毛巾，掩在右臀部上。左手握着镰刀把，刀头夹在胳膊窝里，只有一只右臂前后摆动，步调整齐，高唱军歌，走向劳动场所。

飞机场跑道是混凝土灌注的，倒挺光滑。可是长在四周的杂草，正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样，割了这茬长那茬，一年得割两三茬；割了这处有那处，一个轮回五六处，大家说，勃利割了上互助，互助割完去杏树，吉兴、双河五六处，没有车乘靠走路。

1943年，仲秋翌日，冷风飕飕。勃利国高三个班学生齐出动，去杏树飞机场割草。年逾花甲的老校长，亲自挂帅出马。早5时出发，取捷径，急行军，9点多钟才赶到。

分配给割草的面积很大，正常速度一天是完不成的，何况时间紧迫，又长途跋涉，疲惫不堪呢。尽管如此，同学们都渴望早点儿干完，争取搭上晚上那趟火车赶回去，一个个生龙活虎一般，你追我赶。只听银镰刈草唰唰唰，不闻嬉闹说笑叽喳喳；跟“磨洋工，磨洋工，拉屎撒尿半点钟”比较起来可大不一样了！

杏树飞机场驻军关东军大尉，看到这样的劳动场面，非常满意，特意指派两名士兵抬来开水给同学们喝。休息时，又特意把同学们召集在一起，异常兴奋地训了顿话，夸奖说同学们积极支援了大东亚战争，效忠于天皇陛下……又对站在身旁的陈校长伸出大拇指，不住地称赞：“亮瀾西！亮瀾西！塔伊很亮瀾西！”（好！好！太好了！）还一边给师生们来个举手礼，一边不住地说，“谢谢……”陈校长频频打立正，连连点头，“哈伊！哈伊！哈伊！”不住口。像这样笑容可掬，精神焕发的情形，还是很鲜见的，因为尽受东洋人的斥责和辱骂了！

万万没有想到，同学们的这次劳动感动了“天照大神的神

光普照”，“沐浴了天皇陛下的皇恩浩荡”，这位关东军大尉发“慈悲”，吃午饭时每人发给一个黑面包，真是一桩稀罕事儿啊！

领受了皇军赏赐的“盛情美餐”，就着自个带去的节日“佳肴”，土洋结合填饱肚子，接着又开始劳动。虽然任务过于繁重，由于同学们不顾休息，拼命苦干，直到日落西山，夜幕降临，好歹才算干完，没误搭车时间。尽管是凉爽的秋天，同学们却都汗流浹背，精疲力尽，一停工，吃凉食，打起哆嗦了！

回来时，搭上了火车可倒不错，没曾想，站在运煤的空车厢里，冷风刺骨，冻得同学们牙齿咯咯响，浑身打颤颤，你拥我，我挤你，也不怕弄脏衣服，也不顾蹭黑手脸，像窝雏鸡似的聚成一团。那位校长和几位老师，一直是面向车尾，裹紧风衣，帽檐儿卡到眼皮上，两手紧紧地插在兜里，木然挺立。皎洁的明月，幽静的夜空，难入眼帘；汽笛呜呜，车轮隆隆，难入耳鼓，心急如焚，恨不得一步抵家。

到勃利车站下车时，同学们活像刚从矿井里上来的煤矿工人，涕泪泪流，不少同学患了感冒。那年逾花甲、身体瘦弱的校长，就更不用说了，患了重感冒，住院医治，休养了很长时间。

冬季除雪，只是勃利县城东边的飞机场，由勃利国高学生来清除。飞机跑道上一般是存不住积雪的，即或无风天，降下鹅毛雪片，存下了积雪，也容易清除。唯有飞机场东边沿着蜿蜒丘陵修筑的飞机窝，一遇到暴风雪往往就给覆盖了，飘来的积雪很硬实难以清除。

1943年年末，有一次除雪正赶上“烟儿泡”天，任务紧急，不能耽误第二天飞机起飞。我们班分担清除两个飞机包的积雪，尽管同学们拼命干了一下午，也没有清完，因为赶着往外清，赶着往里飘。负责监督清除积雪的日本士兵和带队的老师研究后，

就决定连夜干。

吃完晚饭回来继续清除时，雪早已飘满，一下午的劳动毫无成效。这时，天公偏偏又与人作对，风越刮越狂，雪越下越大，风卷雪，雪随风，漫天飞舞，昏沉沉，白蒙蒙，天昏地暗。任你费九牛二虎之力，掘起一锹，撮出一块，霎时又给填满。同学们在严寒的黑夜里，顶狂风，冒暴雪，尽管累得气喘吁吁，帽檐儿下热气腾腾，还是不见效果。于是经带队的老师请示日本军官之后，决定暂时停工，等风息了再继续清除。

我们跑回学校教室围炉取暖，等候干活的命令。到午夜以后，风势渐渐减弱，飞雪渐渐停止，又跑回现场去，重新开始清除。天将黎明，才清除完毕，没误飞机起飞，这还得天公开恩，风息雪止，至于一年得除多少次，那也得由天公来决定了。

县公署空袭警报昼夜监守

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国家濒于溃败时期，就更加担忧飞机袭击，已把防空警报看成是挽救垂亡、免遭摧毁的一线希望，严防空袭已经成为总动员、齐参战的军令法规。

防空警报，是“敌人”飞机轰炸来了，防空了望哨发现了，鸣起警报机，发出信号，通知军民对空射击，防备空袭。了望哨设在县公署三楼顶上（县政府楼），是个八角形凉亭式的木房，玻璃窗户宽敞明亮，四周圆形走廊围着木栏儿，东边儿对县城那面安装着警报机，房顶旗杆上挂着“红兰白黑满地黄”的伪满国旗，有风天还可以识别风向。了望哨里备有电话机一台，直通警备司令部执勤长官，由两组透镜组成的可以随身携带的望远镜两台，《警报日志》一本。了望哨的人员两班日夜替换监视，每班四人。

警备司令部，设在县公署二楼北头。正对楼梯的较大的那

个屋是伪正副县长的办公室，由此往北是个大会议室，非常时期做为警备司令部防空指挥所。南头靠墙的讲台上放着一张大办公桌和几把交椅，桌上有一台电话机，这是警备执勤长官的座席。东西两面靠窗台从南到北各摆着一排长条桌，桌上放着防空专用电话机12台，每台旁边放着一本《警报通令录》。专用电话是直接通往县内大四站、倭肯、杏树、八家子、青龙山、小五站、七台河等七个村防空警备所。勃利街公所直属于警备司令部，电话另作他用。专用电话还直接通往罗圈河、桃山、大茄子河、北兴等四个防空警备所的开拓团。每台电话机由一人看守，并负责填写《警报通令录》。

这些警备工作人员是从哪里来的呢？警备执勤长官是警尉补以上的警察官和少尉以上的当地驻军军官，轮流执勤，每班二人，日满人各一，以日人为主。其余那些看电话的和了望哨的人员，就都是勃利国高学生了，美其名曰“警报通令传达员”。传达员下达命令、报告情况，一律用日语讲话。

了望哨的同学发现敌机了，立刻向看电话的同学报告：“发现敌机×架，由××方向我处飞来！”看电话的同学紧急复述报告给警备执勤长官，同时警报机也鸣起来。执勤长官马上下达命令：“通令各警备所！”警备司令部指挥所大办公厅里，立刻紧张起来，电话铃声和呼叫声混成一片。顷刻警报通令下达完毕的同学，急忙跑到执勤长官面前，陆续站成一排，一个接着一个报告：“××警备所，警报通令下达完毕，接令人×××，×分×秒，传令员×××。”坐在正座上的日人听取报告，坐在旁座上的满人执笔记录。这已经是背熟了的一套术语了。虽然十多个人接着报告，也不过五六分钟。倘若有的同学在别人报告完了他还没有下达完，为首的这位日人长官就气冲冲在奔到他跟前，一边骂着，一边把电话抢过去，厉声呼叫：“马上到这

儿来!”这个警备所的负责人可就走了“红运”了，来到警备司令部——这一关可不好过啊！

有一次，我负责通令下达的防空警备所是罗圈河开拓团。警报通令下达完了，向警备执勤长官报告时，因为“拉啊各伊音卡啊”（罗圈河）的“各伊音”没有发好音，又过于紧张反倒结巴起来了，耽误了后面的同学报告，被执勤长官骂了顿“叭嘎”，几拳头就把我杵到墙旮旯儿，罚站一直到下班。

“敌机”在上空盘旋了几圈后，逐渐消逝在远方天空。了望哨的警备执勤长官报告：“敌机×架，向××方向遁去。”这时警报机“呜！呜！呜！”鸣叫起来，空袭警报解除！执勤长官下达给传达员，传达员下达给警备所。下达完了，接着各警备所向警备司令部报告空袭情况，大半是“平安无事”，也有的“炸毁房屋多少间，伤亡多少人”，信口开河，假装正经。

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国家接近溃败的边缘，空袭警报更加频繁，日日夜夜警备不停，勃利国高的学生就得日日夜夜充当警备人员，每隔两周就得轮值三昼夜。这是非常时期沦陷区的奴隶应尽的什么“义勇奉公”、“勤劳奉仕”的“天职”，至于求学读书啊，那就可想而知了。

连珠山撬运弹机奉交迫

1944年11月上旬，勃利国高三年级学生，在刘玉珠老师率领下，去密山县连珠山勤劳奉仕35天。

由勃利车站乘火车，经林口、鸡西，在连珠山车站下车。由东安省（现在的密山市）派来的两名伪官吏作向导，沿着弯曲的山路往北走约七八里路，就是关东军在东安省境内最大的军火和军需基地连珠山。

当来到横穿山谷的铁刺网第一道关口时，这两位伪官吏和

站在大门口等候的一个关东军上士作了交待之后，就沿看来路回去了。把门的和跟这位上士来的两名士兵，挨个搜查，检点人数完了，又领着我们往山里走了二里来路，到一处较开阔的山谷。在山谷东边漫山坡上有几栋板房，这就是我们勤劳奉仕的宿营地。

最前边一栋板房，中间是伙房，西头是仓库，东头是看管我们的关东军宿舍。为首的一位是膝野上士，长得身材魁梧，猪肚形长瓜脸，面貌凶恶。我们都管他叫“鞋拔子”。还有三名上等兵。各校带队的老师也都住在这儿。先后来这里勤劳奉仕的还有杯口国高和密山师道学校，都是一个班50多人。勃利国高住在第二栋板房西头，往后还有两栋。据说这是修军火山洞时劳工住的。

板房已经破旧，龇牙咧嘴，四处透风。屋里用木板搭成的南北大铺，屋地一头一个砖砌大火炉子，都积满尘垢，挂满了蜘蛛网。经过一番打扫之后，按组排号把行李、用具放在南北大铺上，就算安了“家”。

宿营地的四周都是铁刺网围着。沿着山沟东坡再往里走二里多路，是第二道关口，铁刺网的上边还多了两道电网。大门两侧两个岗楼，双岗把守。由此再往里走，大沟小岔，山头岗包，都是装军火弹药的山洞，勤劳奉仕的学生就在这里劳动。

来到连珠山的当天下午，开晚饭前，三个学校的学生都集合在伙房前空场上。膝野上士披挂整齐，全副武装，神气十足地走到学生前面，由密山师道学校的班长统一喊口令向他敬礼。他还先礼用日语喊了一声“稍息”后，开始训话了，先讲了一通儿太平洋战争大日本皇军英勇作战，节节胜利，支援圣战，大东亚总动员的大道理，接着提出了几条训令：一条，作息时间，要严格遵守；二条，听从指挥，他把三个上等兵分别加以介绍，

每人分管一个学校；三条，守口如瓶，作业时看到的情况，不许外讲；四条，不准随意外出，35天内，特殊事情外出时，得请假，由带队老师请示他批准；五条，进入现场作业，任何人不准带火吸烟。以上五条有违犯者按军法处治。

每天早晨5点钟，都是刺耳的号声夹杂着“起床！起床！”的呼叫声，把同学们从忧惧的梦乡里惊醒。那位上等兵和带队的老师常是一起走进宿舍来催促。我们急忙穿衣、叠被、站排、跑步、作操、用餐，集合出发赴现场劳动时，太阳尚未出来。

进出第二道关口，天天是早、午、晚两进两出，都是二路横排站好，班长向门卫报告人数，报数检查之后，若是不耐心，叫出来一两个摸摸兜，搜搜腰，装模作样检查一下还算不错，若是认真起来，尤其是出来时，几乎挨个都得摸摸搜搜，耽误的时间就得用跑步来弥补；若是弥补不上，超过规定时间，管现场的军衔如果比管我们的军衔高就得挨训斥、受辱骂。

进了第二道关口，走不多远，这三个学校就分别往自己学校作业的沟岔走去；进了沟岔又按组分开，每组包一个山洞。山洞的形状也相同，有的像一个圆形的大谷仓，有的是由一条隧道分出了几个洞。山洞里储藏的多是弹药和武器。漫山坡上用苇席、苫布遮盖着的一堆堆、一垛垛，则是除弹药以外的其他军需物资。

我们劳作时看到的弹药，有连珠、大盖、套筒、“三八”等各种步枪子弹和轻重机枪子弹；有榴弹炮、迫击炮、高射炮等各种炮弹；还有手榴弹、炸弹等等。这些弹药多数是张作霖统治东三省时，沈阳兵工厂制造的，东北沦陷后被日军夺去，又运到这里来储存。山洞里阴黑、潮湿，弹药存放日久，弹壳已生绿锈，弹丸已氧化成灰色。来这里勤劳奉仕的学生，主要是用砂纸把弹药上的锈蹭干净。

我们来往经过第二道关口时，常遇上一伙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劳工，晃晃荡荡，颓靡不振地出入工地。他们住在哪儿，干些什么苦力活，我们都不详细。据说这些人都是从关里抓劳工抓来的，修完军火山洞也不放回去，怕泄露其中的秘密，所以便被处死。

勃利国高全班学生分成四组，每组包一个山洞。头几天还比较轻松，由身高力壮的同学把弹药箱子扛出来，放在洞口或洞口与洞口相连接的大道上，大伙围在一起用砂纸往下蹭锈。完了，再装进箱子里，钉好，扛进去。往后一天比一天紧起来了，定时间任务，三个人为一小组，自己搬运，擦一箱弹药。如有到收工时干不完的，就得大伙帮助干完。有的组同学干活较慢，格外使劲也常落后，就不好意思总叫同学们帮助，于是就偷工减料，把没蹭好的装在箱子底下，想蒙混过关。没曾想，在收工时被管现场的士兵发现了，狠狠地骂了一顿“叭嘎！”，杵了一顿拳头，又全都倒出来，非叫他们组人给重新蹭好不可。还不准别人帮助，叫其余同学先收工回去。

可走到第二道关口时，门岗一检查少了三人，不让过去。带队教师向他说明原因，他叫都在此等候，一起回去，尽管一再请求，也是不行。万般无奈，带队教师只好领一些大同学又跑回去，向管现场的士兵一再恳求、说明、致歉，才允许别人帮助干完，放他们三个回来。其余那些同学就得站在那儿挨冻，等他们回来重新检点人数后，才一起放过去。

打这以后，检查得更严了，谁也不敢再蒙混过关了。先干完的小组就主动去帮助没干完的同学，好一起收工，一块回去。

就这样，磨啊！蹭啊！一天天挨过去。双肩划破了，压肿了，两手磨破了，冻僵了，也得坚持到底，坚持干完35天。陈林同学扛弹药箱子压吐血了，一直坚持干完。回到学校后，即

回家休养。第二年春季开学升入四年级，他因吐血未好而休学了。

紧张、艰苦的一天劳动，应该得到温饱，很好休息，恢复体力，可是，这些勤劳奉仕的学生又怎样呢？还是看看我们的吃住吧。

住的板房，早已破旧，既不遮风，又不御寒。没有风的夜里，同学们也是常常轮换着围炉取暖，唉声叹气，默默无言，屈指计日，度日如年。

在北风呼啸大雪纷飞的夜晚，板房里冷风飕飕，灰尘弥漫，马灯昏暗。同学们，裹紧棉袄，系紧腰带，扣上帽耳，抄着双手，跺脚踏步，缩颈端肩，浑身颤栗，通宵达旦。有的同学实在熬不住了，就和衣躺在冷铺上，蒙上被子，卷缩一团。早晨醒来如同睡在雪地一般，雪掺灰尘覆盖一层。

伪满时，东北沦陷区被蹂躏的“满洲人”，所有衣食品都得配给，就连对勤劳奉仕的学生一日三餐也实行配给。

做饭的大师傅是由各学校选派的学生，高粱米、大糙子，不是夹生，就是串烟；几乎顿顿都是土豆汤，一碗汤喝完了，碗底上一层泥。这样的饭菜要能吃饱了，也算不错了！吃饭时十五六人为一组，轮流由两名值日同学上厨房去打来，同学们按自己睡觉的铺位坐好，等候值日同学把菜饭分盛在每个人的碗里。若是剩下了就再分点儿。这样，等平均分完了，也就凉透了。还得一齐用日语说一声“受领”才可以吃。真是饥不择食，吃得舔嘴巴舌的，舍不得放下碗筷。先吃完的还得坐坐那儿等着，等都吃完了，还得一齐致谢。

谁要轮着值日，这一天还算不错，打饭时偷偷摸摸握个大饭团子，用手绢包好，揣在怀里，找个机会溜到一边把它吞掉，这一天总算没挨饿。

有的同学上伙房去打水，顺便揣回几个土豆，或拣回几个白菜根，趁夜半更深放在火炉子里烧熟充饥。这若是被巡夜的士兵遇上了，他就脱下皮拖鞋，挨个打嘴巴子。他打完了，还叫同学们站成一圈儿，你打他，他打我，我打你，打了一个圈儿再倒回来打，谁要不使劲，他就打谁给作样子。打够了还不死心，又拿起烧糊巴的土豆往脸上连烫带蹭，弄得同学们脸上红一块黑一条的。洋鬼子蹂躏、践踏沦陷区的青年学生，所使的花招真是千奇百怪，所要的手段真是阴险毒辣！

一天，吃完午饭，于子清同学向刘玉珠老师请假，说是连珠山车站眼前的小屯子有家亲属，他想去借棉衣，刘老师向滕野请示了之后，给开了“外出许可证”，经门岗检查之后，才放他出去。

晚上4点多钟，天已黑了，于子清同学才匆匆回来。门岗检查他双肩背的日本式大背兜，分量很重，叫他把背兜放下来，打开一看，上面是他自个穿的小棉袄，底下全是大煎饼，门卫急忙给滕野打电话。恰巧，这天下午滕野上劳动现场检查去了，门卫收下他的外出许可证，先放他回工棚子。

于子清同学回到工棚子里，往买煎饼的同学的铺盖卷里藏大煎饼，刚要藏完，同学就收工回来了。他惊慌失措地对同学们说：“不好了！快把煎饼藏好！叫门卫检查出来了。”大家慌乱一阵，掀起铺盖卷儿去藏煎饼，还没等消停，滕野就逼着刘老师气势汹汹地一前一后走进来。同学们好像耗子见着老猫似的，急忙跑到各人铺位坐好。滕野走进屋来二话没说，瞪着眼珠子，恶狠狠地拽过来几个铺盖卷儿，抖落出来两卷煎饼，叫刘老师看，又凶神恶煞地用日语逼问：“怎么样？明白了吧！”把刘老师训一顿，又命令他：“交给你了！看你们怎么办吧！”

刘老师心里早已明白，万般无奈，才忍气吞声，咬紧牙关，

装模作样，打了于子清同学两个大耳光子。这下子不要紧，倒把“鞋拔子”给惹翻了！解下他腰上扎的橡胶皮带，左右开弓就抡起来。直抡得于子清同学浑身上下青一条、紫一块，于子清一声不吭，忍痛屹立。马灯昏暗，阴气森森，盘膝而坐的同学们目瞪口呆，心急如焚，怒火中烧……

抡完了大皮带，“鞋拔子”又命令学生把铺盖卷儿都抖落开，把煎饼拿出来摆到个人前边。他也真够“殷勤”，不嫌麻烦，沿着南北大铺绕场一周，一份儿一份儿地把煎饼都给塞进火炉子里了！这个家伙才得意忘形地走了。

“鞋拔子”走后，同学们盯盯地瞅着刘老师，刘老师呆呆地伫立着，相对默默，泪珠盈盈，泣不成声。久久……久久！刘玉珠老师悲愤填膺，语重心长，喃喃自语：“我们……我们是……中国人哪！忍耐……忍耐吧！总有一天……会熬出头来！”

同学们更加悲愤，呜咽起来……

新立屯垦荒种田直到光复

1945年，春季开学个月有余，勃利国高三四年级两个班学生100多人，离开故乡，到密山县杨木岗村新立屯去勤劳奉仕、垦荒种田。

上新立屯跟上连珠山是同路，经过连珠山，再经过密山，在虎林这边的宝东车站下车，再往东南走有百余华里，距兴凯湖约15公里的地方，便是我们垦荒种田的新立屯。

由宝东车站到我们种地的地方，再一直往东、西、南都是一没平川，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和新开垦的撂荒地，没见着一个像样的屯子。在我们劳动这边，约五六华里却有一片废墟，荒凉、凄惨的景象令人心寒。据说这是东北沦陷以前建立起来的有五六十户人家的一个屯子，当时命名为新立屯。日寇侵占了

东三省，为了便于统治，把这个屯子的居民给撵走了，新立屯这个村名却沿袭下来了。

这片废墟的北边有一座庙，尽管破陋不堪，仍肃然伫立，是我们过往此地的必游之处。庙内几尊神象已经折胫断臂，浑身伤痕，挂满罗网，积满灰尘和鸟粪。

由这片废墟再往南走，奔兴凯湖的方向，约五六里路，才是我们勤劳奉仕的宿营地。这段路程不是能通行车辆的大道，而是过洼塘蹚塔头，跨草甸子，踏草筏子，穿树棵子，新踩出来的一条弯曲的毛道。在略凸起的小荒丘上，搭成几座我们住宿的板窝棚或席篷子。

小荒丘上，还残生着稀稀落落的杂树棵子。西南边是去年新开起来的大片撂荒地，没有耙细，草筏子的缝隙处长满了黄蒿、杂草、各种嫩树条子。东边是新挖出来的运河，有七八米宽，两米来深，一直往南下去，国兵濠子还继续在挖。通新立屯儿的那条大道，被运河给截断了，在我们耕种的撂荒地的西南，是几处日本移民——开拓团的驻地，稀落的房屋里只有女人留守，新开垦的大片土地多未耕种，呈现出一片凄凉、寂寥、荒芜的景象。

上新立屯垦荒种地的学校除勃利国高外，还有密山工业国高，密山师道学校和林口国高，都是三四年级两个班学生，四所学校共有400来人。勃利国高三四年级学生混合在一起，编为四个劳动中队，在四年级学生中委派中队长领导劳动。

初到劳动现场时，有几个负责指挥开荒种田的日本士兵，指手划脚地分配住处，安排活计。其中为首的一个生得尖额头，洼扣脸儿，眊眼，黑嘎胡，鼻梁上总卡着墨镜。这家伙凶相恶煞，真够吓人，我们都叫他“丧门星”。各校带队的教师，见着他都垂手侍立，听他摆布。“丧门星”把头一段活计安排完了，领着

两个亲随就走了，也不知道干啥去了，只留下一个吃粮不管事的小山，在这儿逍遥自在。

头一段活计是割洋犁片缝隙长出来的黄蒿、野草、杂树棵子，每人拿两趟往前割，割够一背还得背回去。越割越远，越远越慢，一直割了五六天，才干完了第一步活计。可也不错，伙房跟前儿堆起了柴火垛，一举两得，做饭有柴烧了。

下一步活计是计划用机器把撂荒的洋犁犁过的地耙一遍，不打垄，淹种。不知什么缘故，耙地的机器不来了，这个“丧门星”带着两个随从却匆匆忙忙地赶回来，召集各校带队的教师开了一下午会，又重新作了部署。第二天上午，又亲自到地里去，指手划脚忙活了半天，下午趁我们下地劳作的机会，又蔫不唧地溜走了。

打这儿以后，我们就按照“丧门星”的规定去劳作。两个人一组，一趟洋犁片当做一条垄，一人刨地，一人点籽儿。地的直径得一尺左右，把草杈子刨碎再点籽儿。一垅就得刨十几趟。照这样下去不光挨累，进度也太慢，一天干不多少。再加上每隔三两天，就得轮流有一个班去背吃粮和豆种，还得去一个班打烧柴。就这样干了10多天，才种上将近一半儿。

快到芒种了，一天早晨，忽然间“丧门星”领着两个随从又跑了回来，我们正在集合出工，他把带队的教师留下，嘀咕了一上午，又作了重新部署。这回更是匆忙，吃完午饭喝得醉醺醺的，都没来得及休息就走了。下午集合出工时，各校分别开会传达了“丧门星”的部署。大致是：过了芒种，不可强种，抢时间，定任务，顶芒种抢种完。这下子可把同学们的“积极性”给调动起来了，可真加了速度，三两趟就把草杈子刨起一块，用镐往起一掀，抓把豆种儿往下面一塞，就种完了一垅。下一垅，也许走上几步再刨一个，临末了，索性刨起一大片，往

起一撬，把剩下的种子往底下一倒，就结束了半天的播种任务。

盛夏期间，田间锄草时，即景生情，使我们联想到种子的生命力该有多么强大啊！那么大块的草筏子都被压在底下的豆种发芽给顶起来了。同时又为之担忧的是“丧门星”此刻若再降临，那又该怎么样呢？幸亏安排完了“抢时间，定任务”那段活计以后，他们就逃之夭夭了。

这些垦荒种田的同学们，从打来新立屯一直到光复时离开，每天吃的都是大豆、高粱米、苞米面三色主粮，并且多半是发霉的。学生做饭，又烧现打来的湿柴，煮出饭来不是串烟，就是夹生；蒸出窝头来不是欠火，就是碱小；几乎顿顿都是大豆汤，再不就是炒盐豆儿。吃大豆可没法限量，因为豆种没数，不过可不能顶饭。有的同学还把豆种偷偷地揣出去，上挖运河的国兵辮子的厨房找做饭的大师傅换大饼子吃。若是采来野菜，熬顿菜豆汤，那就美餐一顿，改善生活了！

下面这套话，已经成为同学们的口头禅了：

窝火头，珠泪汤（滴）；伤心饭，苦菜香（汤）；干起活儿懒洋洋，冒虚汗，心发慌；思家乡，泪汪汪。

吃的发霉的高粱米、苞米面儿，还有种的大豆种，都得自己去往回背。上哪儿去背呢？就是在前边已经提到的旧废庄儿，庄儿北边的那座庙，庙前边有两栋旧房子，就是我们去背粮的仓库。这是供应新立屯左近的日本开拓团、苦力、国兵辮、勤劳奉仕学生的唯一粮食基地。

不管风天雨天，每隔三两天就得轮流去一个班背粮，因为背多了还没有地方存放。按个子高矮，体力强弱，背15~25公斤。一个个都累得气喘吁吁，汗流浹背。

住的低矮的板窝棚、席棚子，闷热、憋屈，使人抑郁；潮湿、阴暗，令人烦躁。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什么磨虻、蚊子，

还有“刨饼儿”、小咬，这些吸人畜血液的小飞虫，也随着扑向人们。尽管你双手持物不住驱打，它也拼命扑向脸上、耳朵、脖子、手背、脚脖，狠命地叮几口，起个血泡，痛痒难忍。还想睡觉吗？于是就得笼起火来，压上湿柴，冒起浓烟，宁肯烟熏、挨呛，只有驱除这些小东西，紧闭门窗闷起来，才能让你入梦乡。

同学们一天天地盼哪！等啊！度日如年。一直到8月9日。那位留守的小山，他不怎么知道了虎头被苏联飞机轰炸了，这天早晨很早就起来吹起床号。劳动阵地的司号员是我们班的朱宝禄同学，小山学着吹号，平时也常抢着吹。已经被他吹醒的同学听出来又是小山吹的，就不耐烦地斥责：“这鬼崽子睡毛愣了？真他妈讨厌！”谁也没有起来。不一会，小山和各校带队的老师一边拿棒子敲门，一边喊：“还不快起来！苏联飞机来了！昨天把虎头都轰炸了！”

同学们听说苏联飞机过来了，惊慌失措，手忙脚乱收拾东西，捆行李。有的同学把被褥套都拽扔了，准备升学考试带的书本分量虽重却都背着。有的手脚慢的同学还没有来得及吃饱，就都跑出去看苏联侦察机隐隐约约凌空而过。这时简直是乱了营的“败兵”。

尽管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带队的陈惠宣老师还尽了最大努力，做了安排：选派三、四中队队长刘玉书、张国军两名同学为先，带着护照、现款，先去宝东车站联系购买车票，到宝东一家烧锅安排晚饭。

我们背着行李，怀着惊慌、恐惧的心理，忍饥挨饿奔走了百余里的路程。太阳快要卡山，我们逃到宝东车站南边的漫岗上时，车站上的景物历历在目。突然间，“轰隆！轰隆！”几声巨响，好似天崩地裂一般，震得人们毛骨悚然，——汽油桶爆

炸，宝东车站浓烟翻滚，火光冲天；火车汽笛狂吼悲鸣，开出宝东车站；哀嚎、狂呼声使人胆战心寒，凄楚难言。被甩下的人群，彼此难顾，四散逃亡。

目睹此景此情，好似晴天霹雳，同学们三个一伙，五个一群，嘈嘈嚷嚷，你呼我唤，一哄而散。我们一伙5人，当天晚上没走，在宝东车站附近的一家农民家里投宿一夜。次日（10日）凌晨，随着逃亡的人群奔走，路上遇见4名同学，一行9人奔走了五六天，15日到家里，遭到战争炮火洗礼的勃利县城，苏联红军的坦克部队已经开进来了。沦亡十四载的东北三省，又回到祖国的怀抱。

学生应以学为主，伪满时期的国高学生又以什么为主呢？在四年学习生活中，除去美其名曰“勤劳奉仕”的时间，剩下的还能有多少学习日呢？回首昔日沦陷区的奴化教育，就更加珍惜今天幸福的学习生活了！

（摘自《勃利文史资料》）